

目录 contents

温州史志

WENZHOUSHIZHI

存史

资政

育人

2022年第4期
(总第141期)

■ 专 题

- 03 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 工作交流

- 18 浅谈期刊杂志在史志宣教中的重要作用
兼论如何办好一本史志期刊
——以《温州史志》为例 吴 华
- 23 如何编写一部好的乡镇(街道)志 吴德明

■ 资政专栏

- 27 传承红色基因 守好红色根脉
纵深推进浙江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
王 祥

■ 史志释读

- 35 《财计上》中叶适的治国理财思想 张声和

■ 历史人文

- 40 忠为立身之本 义是涉世之道
——瑞安忠义文化形成及传承研究 谢公望
- 55 曹湾山、屿儿山“好川文化”遗址
发掘、保护利用的思考 李岳松 李培怡
- 65 苏璠与大雅山房 苏志挺

目录 contents

■ 红色文物

- 73 密室中的红色星火
74 “六面密印”隐藏的秘密
76 吴毓的家书

■ 革命人物

- 78 建塔者——项牲传略

■ 志说温州

- 85 温州陈皮：冠绝唐宋 金益丰
88 温州民间俚语六则

■ 诗意温州

- 94 永嘉四灵诗词中的温州元素 李亮

封二：图片报道
封三：书法作品
封底篆刻：蓝潮

温州史志

2022年第4期
(总第141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温州史志》编委会：

主任：赖晓华

副主任：魏仕阔 钟体琪 何念国
吴华 张声和 张致光

委员：张林洁 郭东升 周婷婷
厉靖 陈好 康丽跃
金默

主编：赖晓华

执行主编：吴华

副主编：张林洁

责任编辑：陈静 李亮

校对：杨建明

地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一号楼

电话：88968780

传真：88968777

E mail: wzds@zjds.org.cn

邮政编码：325009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刊号：浙内资准字第C044号

印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声明：除作者另有声明，本刊对来稿有权修改。来稿文责自负，因原稿问题引起的侵权纠纷，本刊不负连带责任。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特殊声明，即视为已许可本刊进行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投稿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

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江泽民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江泽民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江泽民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抒发悲愤心情。

1943年，江泽民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泽民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江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江泽民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掩护革命同志。

1947年，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

此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江泽民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1954年9月，江泽民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4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5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年，煤炭供应紧张，江泽民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1962年，江泽民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急需的JO2小型异步电机系列的设计任务。1964年和1965年，江泽民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

日本、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1966年5月，江泽民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9月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泽民受到冲击。1970年底，江泽民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1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负责领导中国援助的11个工厂建设工作。1973年回国，江泽民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73年、1974年，江泽民先后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1976年，江泽民率团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国援建工厂建设情况。1978年，江泽民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访问欧洲六国，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年，江泽民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以往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1980年，江泽民先后率团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吸取可供中国举办经济特区借鉴的经验。同年8月，江泽民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2年5月，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

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发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82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江泽民出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导建立了民主党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

大上海对外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他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同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着重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

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

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全党工作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敏锐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进程。他提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江泽民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

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共十六大上，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江泽民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不断

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和人才总体需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道理，这就是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提出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他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江泽民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

考。他指出，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们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他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1992年6月，他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中共十四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中共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共十四届三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江泽民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他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他强调，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阐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江泽民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以质取胜，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他强调，中国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冲

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江泽民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他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世纪之交，他

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江泽民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强调，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他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努力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江泽民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

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对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提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

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他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他提出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此后进一步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他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他强调，要

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尽快形成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

江泽民指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他领导推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一系列准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实现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实现澳门回归。他先后赴香港、澳门参加中英政府、中葡政府举行的香港、澳门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广泛团结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下，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团结各界人士，妥善处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江泽民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推动两岸双

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1995年1月，他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台湾独立”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愿望和台湾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他提出文攻武备总方略，领导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他郑重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坚信，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面对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江泽民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

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他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提出，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推向新水平，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他提出，要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他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他提出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他推动

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泽民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号召全党同志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完整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民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他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强调，只要全党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

江泽民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

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他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各项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强烈的公仆意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江泽民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他团结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

争的全面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江泽民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江泽民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江泽民文选》主要收入了江泽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江泽民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文章来源：新华社）

浅谈期刊杂志在史志宣教中的重要作用 兼论如何办好一本史志期刊

——以《温州史志》为例

◇ 吴 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由此可见，宣传教育工作在党的建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今，我们身处融媒体时代，宣教的载体非常丰富，比较常见的有期刊杂志、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短信、短视频等；宣教的形式也十分多样，有图片展览、情景话剧、主题音频、现场宣讲等。不可否认，每一个平台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每一种形式也都有其独特的专长，都能在特定的场景中发挥出强大的宣传教育功能。但是，在笔者看来，期刊杂志在史志宣教工作中的重大作用是其他任

何平台替代不了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史资政育人能力。《温州史志》作为一份季刊，1年出版4期，每期8—10个栏目，约20篇文章，8万字的体量，涵盖“资政专栏”“史志研究”“志鉴交流”“历史人文”“岁月回眸”“革命人物”“志说温州”等栏目，能对时政热点、志鉴编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进行点评、交流和记录等，为史志爱好者和研究者留下丰富的素材。如，《温州史志》每年都会分2期编辑出版上一年度的市委市政府执政纪事和核心决策聚焦，将上一年党委政府做的大事、要事进行梳理刊发，对史料存储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与全省第十次党史工作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袁家军提出“一年一编大事记”的构想不谋而

合。此外，杂志一期发行1700册，通过内部赠阅的方式寄到各机关单位、高校图书馆、乡镇文化礼堂等，读者群体包括高校和地方的史志专家学者，各地史志工作者、爱好者，也有普通市民，传播范围非常广泛。

（二）学术承载力。《温州史志》的稿源十分多元、丰富，撰稿人有来自史志部门的一线工作者、高校史志专业的师生、史志学会的老同志和党史地方志爱好者等，他们的文章，史实考证严谨、学术功底扎实、思想观点新颖，期刊正好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交流和探讨的平台。如，谭桂涛《试论如何将地方志融入高中教育教学研究》一文，将地方志和高中教学联系起来，进一步拓展了刊物涉及的范围，为高中课程设置提供帮助；林丽娜《论如何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地方党史职能优势——以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为例》一文，将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创新做法、困难挑战和下步的思考整理出来，其他地区的史志工作者可以在这样的分享中发现自己的欠缺和不足，或者对其提出的困惑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双方在业务水平上更加精进。

（三）舆论指引力。当前，意

识形态的斗争形式仍然非常严峻，一段时间以来，有人以“重估历史”为借口，以“史料钩沉”为幌子，妄图歪曲历史、割裂源流，否定党史的主流和本质；有的以庸俗、低俗、媚俗的手段涂抹历史人物与事件；有的丑化党的领袖，对英模人物进行“戏说”“恶搞”；还有的对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等搞所谓“重新评价”“历史翻案”等，这对我们史志期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刘锡荣《永远跟党走》、王文胜《深刻领悟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正确历史观指导新时代党史工作》等文章，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典范。史志期刊作为史志宣教平台，既是学术前沿阵地，更是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我们要善于发挥它的作用，用文章和思想作为最强大的武器，激浊扬清、正本清源，扛起为党修红色家谱、传递红色能量的重要职责，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除了上述3个方面以外，史志期刊还是史志部门的门面，期刊整体质量

的好坏，直接反映一个单位工作水平的高低。任何一个史志部门，都应该把期刊作为定期向外展示自己的主舞台，在日常事务中将其提升到重要的位置。

那如何办好一本史志期刊呢？在我看来，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筑牢政治性。坚定的“政治性”，能让史志期刊“站得住”。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姓党”的重要论断，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党史工作性质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党史工作方向作出的明确定位。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树立正确党史观”；2021年5月9日，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这些论述都给我们指明了明确的方向——史志期刊是党委部门的刊物，坚持党性、政治性是毋庸置疑的。具体的体现可以是在排版上，我们要将前面几个专栏留给党史宣传，形式可以是时政新闻，也可以是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文章。《温州史志》会在开篇设立“重要讲话”“史志要闻”“党史研究”等栏目，为期刊的政治属性奠定基调。

（二）突出学术性。笃实的“学术性”，能让史志期刊“立得稳”。顾名思义，史志期刊中的“史志”二字，代表了非常强的专业性，针对的就是党史和地方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关于党史研究成果，如郑昌儒《浙南早期先进分子对地方建党的重要贡献》、周国林《温州市党史资料征集的编研工作回眸》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题，其中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党史工作的综述，史实准确、论证严密、内容丰富，对很多课题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其中，我们要着重注意的是，在历史上已经有定论的问题，我们不做过多的探讨。对于地方志的研究成果，如金雄波《谈谈地方志书编写中的若干错误事项》、任瑾洛《论地方志鉴文本信息化的“三部曲”》等，对志书编写和志鉴信息化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深度挖掘材料和信息，开辟学术争辩专栏，争取把相互探讨的氛围搞得更加浓烈。如《温州史志》2021年第3期和第4期，就连续刊登了《众山遥聚首，孤屿留诗韵——孟浩然瓯越踪迹》和《孟楼还是浩然楼？》两篇文章，对江心屿上的“浩然楼”这一名称是否与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有关这一话题

展开精彩的论述，双方摆事实、讲道理，不同的学术观点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三）提升文学性。生动的“文学性”，能让史志期刊“行得远”。文学性是可读性的保证，所谓文史不分家，史志作品不能没有文学的支撑。《温州史志》的稿源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同志的回忆文章，虽然内容都是切身体验、真情实感，但是文章表达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文理不通，有病句、错字别字等，编辑的耐心和细心受到极大的考验。不过，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把文章修改好再发表，保证质量，决不将就。温州是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发祥地，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任永嘉太守期间，留下了大量描写温州秀美山川的诗作，为此，我们还在《温州史志》上做了一个小小的尝试，从2021年第1期开始，专门开辟了一个“诗意温州”的专栏，向读者推介历代与温州有关的诗人与佳作，受到了读者群体的认可和好评。如，潘孝平《南雁荡山脉的不老传奇》、彭松生《冰天雪地祭英雄》、陈盛奖《旗杆内没白身人》等文章，充满文学性的标题，让人一看就有想读的欲望。文章的文学性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读，从而真正

实现它自身更大的价值。

（四）拓展知识性。广博的“知识性”，能让史志期刊“讲得透”。虽然我们在前面“学术性”中谈过了史志期刊的专业性，但是一期8万字的内容，也不要将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学术探讨的范围之内，可以在史志的根基上向外拓展、向上延伸。文史不分家是学界共识，在我看来，历史、人物和地理也是一家。在地方志的一些文章中，历史和地理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向“地理标识探究”“古代地名溯源”“当地传说考证”等方面展开探究。如陈彤《蔡必胜传》、胡进士《金钱会与江西垱》、苏尔胜《北鹿史话》等文章，都可以让读者在阅读中对温州的一些历史人文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拓展视野、获得知识。

（五）增加趣味性。丰富的“趣味性”，能让史志期刊“传得广”。史志期刊作为一个相对严肃的学术刊物，趣味性就一定要作出让步吗？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首先，我们要尊重学术的严肃性，在每一期的内容上为党史和地方志的相关研究留足空间。但是，一期刊物里面的栏目有很多，大可以尝试在末尾开辟几个有趣味性的专栏。比如，当地民间传说、温州话俚语由来、逸闻趣事等等。

以上5个方面,《温州史志》大部分已经开始进行尝试,小部分还在谋划中,将在未来的刊物上逐步付诸实践。期刊是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编辑部要做的就是坚持办刊主基调,把

舞台搭得更大、搭得更好,让更多人知晓史志期刊,也能有更多人在史志期刊上有所收获。

(作者系《温州史志》执行主编)

公益广告



如何编写一部好的乡镇（街道）志

◇ 吴德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镇变街道、村庄变社区、村民变市民，留住乡音、乡愁，让后人对以前的生活有迹可循，编修乡镇（街道）志书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载体。编写一部好的乡镇（街道）志书也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评价一部乡镇（街道）志的好与坏呢？

一部好的乡镇（街道）志需要达到三点要求：（一）符合《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为规范地方志书编写，确保地方志书的编纂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14年制定《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关于地方志书质量总体要求是：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制规范。（二）内容记载完整。方志是“一方全书”。国务院于2006年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表述：“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所以，凡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内容，志书都要求记载完整，不能缺失。（三）彰显地域特色、突出时代特点。从《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书的定义来看，乡镇（街道）虽小，但乡镇（街道）志“五脏俱全”。因此，乡镇（街道）志编修既要抓记载完整，更要抓特色、特点。如果机械地按照市志、区志的篇目结构来搜集编写材料，面面俱到，如此编修的志书会千篇一律，千志一面，缺乏个性和特色。所以，在篇目设计上可打破常规，该升格的升格，以彰显地域特色、突出时代特点。

从前两点要求中我们不难看出，乡镇（街道）志书的编写需要汲取古今修志经验，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严守体例，述而不论，文约事丰。志书是官书，官责官修，具有权威性，是一方信使，必须严肃认真地去

研究。二是坚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存真求实，体现志书的资料性和存史价值。方志是一方之全书，一方之全史，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等无一不在方志记述范围之内。横向要反映一方之全貌，因此在拟定篇目时，要深入研究，做到广辟类目，尽其所有，无所不包，也就是要做到横不缺项。纵向要反映断限内各行各业的发端、发展与现状，即对事物的历史演变过程全面记载，也就是要做到纵不断线。在记述时不能泛泛而谈，要有完整资料反映事物发端、发展与现状，要体现事物动态的全过程，选用有价值的典型材料。三是坚持以人为本，从读者出发，为读者服务，努力创新，提高志书的可读性。四是坚持志书的信达雅，努力避免总结式、年鉴化倾向。这就要求编撰人员全过程参与资料的收集与编写，了解志书与年鉴的区别，在整体把握，抓住实质的基础上，反复锤炼，润色加工。这也在无形之中回答了编写乡镇（街道）志需要采用什么模式、何种体例、多大篇幅等问题。

而关于第三点中“彰显地域特色”的要求，在实践过程中编撰人员遇到很多掣肘的问题，解决起来也非常困难。比如不少地区乡镇与乡镇相

连，其地形地貌、气候物候大同小异，物产资源、经济类型比较相似，民风民俗、人文环境相差无几，在志书编写过程中，所谓的地域特色这一模块就形成了“你无我有、你少我多、你大我小、你劣我优”的局面。其实，地域特色是一个普遍性概念，不能仅从某事物的有与无、多与少、大与小、优与劣去下结论，它主要表现为共性中的个性、一般中的特殊。

如何彰显志书的地域特色，自古以来的名志佳志，无不在此有所建树。地域特色是一个地区独特优势所在，是区位优势的新鲜要素，必须写得浓墨重彩。在编修前，要对该乡镇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找出这个乡镇的特色，从而丰富这些特色的材料。反映地域特点的资料能够全面反映本地的长处与短处、优势与劣势，从而为制定本地发展规划，扬长避短，提供依据。如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编纂的《棘洪滩街道志》，把“盐业”从“农牧林渔业”篇中升格成“盐业”篇。棘洪滩地处胶州湾北岸，滩涂连绵，地理位置优越，海水资源丰富，交通运输便利，制盐历史悠久，是全国闻名的海盐产地之一。“盐业”篇下分四章：滩场、盐业生产、盐业运销、盐政。

其中“盐业生产”章分八节：制盐、盐田建设、盐田开发、制盐工具、海盐产量、海盐质量、盐化工、海产养殖。“盐政”章分四节：管理机构、盐法、缉私、盐政风暴。志书运用相当篇幅详细记述了“盐业”这一特别物产生产、运输、管理过程以及统治阶级对这一特殊产品的特别管理，同时，也记述了劳动人民与之的斗争。纵观盐业篇这样一部盐业发展史，既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史，又是劳动人民的抗争史。这就是当地最鲜明的地域特色，这样详细的记述，可以反映出当地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为本地发展规划提供了较大的支持和帮助，为后人了解这一时期的特色产业提供了有效途径。

那志书中又如何体现第三点要求中“突出时代特点”的要求呢？不同于首轮修志反映出的社会基本资料，本轮修志主要反映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乡镇（街道）志的相应部分，应站在地方发展角度精选材料，记载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轨迹；记载几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如何变成了城市居民和新型合作社的股民；记载人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乐的变化等

等。如《流亭街道志》，把“外经外贸”从“工业”篇中升格，独立成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流亭街道凭借区位优势，通过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招商机制、调整产业布局、出台优惠政策、发动全社会招商等措施，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到2003年，全街道累计引进外资企业591家，合同利用外资6.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9亿美元；贸易出口额4.1亿美元，成为江北外经外贸第一街道。在“外经外贸”篇中，又分管理机构、招商引资、对外贸易三章。不仅较充分地反映了外经外贸的强镇风采，也体现了改革开放赋予的鲜明时代特征。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在记述具体事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用具体确凿的材料，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明代的刘鲁生曾经指出，一部好的志书应该是“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十分看重材料的详悉性，把它作为衡量志书优劣的三条标准之一，并置于首位，这是颇有见地的。材料要详悉，对事件的基本要素要交代齐全，尽可能地具体确凿，切忌笼统、空泛。材料要记述得具体确凿，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充分发挥数据的作用。数字具有高度的严

密性，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字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当今世界许多学科都日益走向数字化，新编志书也应当走这个方向。如《河套街道志》第二篇“自然环境”第二节“水灾”记载：“1914年6月，连降暴雨，大沽河、桃源河洪水泛滥，庄稼淹没。”该街道1997年水灾这样记载：“8月19、20日，第11号强热带风暴袭击河套，降雨210毫米，大沽河洪水泛滥，3800亩虾池被淹没，1000亩被冲毁，损坏树木3300株，秋粮绝产；21日凌晨，由于受大沽河上游降雨影响，水库暴满，河道溢洪，又受大海潮顶托，洪水导致桃源河4处决口，致使1000亩粮田、10处砖瓦场、1000多亩虾池被淹，经济损失达2000多万元。”后者记载由于运用了统计数据，灾情记述相当具体，科学性比前者笼统空泛的记载详实、可信。

最后，还要注意的一点是，“真

实是志书的生命”。如何客观、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述一个乡镇（街道）发展轨迹，在正面记述成绩的同时，应如实记载失误，做到秉笔直书，不文过饰非，不隐恶避嫌。这是品质是每个修志工作者都应该具备的。客观地记述失误和负面的东西，立此存照，主要是让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乡镇（街道）的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前人创业的艰辛，作为后人应牢记历史的教训，避免后人重蹈覆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果一部乡镇（街道）志书，到处都是莺歌燕舞，一片歌舞升平景象，通篇是光辉成绩，毫无失误和挫折，起码是不全面的，会误导后人，更谈不上有“资政、存史、育人”的功能了。当然记运动和失误必须摒弃肆意夸大和某些偏激、片面的描写和记述，要维护和坚持党中央的原则和立场。

（作者单位：青岛市城阳区党史研究中心）

传承红色基因 守好红色根脉

纵深推进浙江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发展

◇ 王 祥

由于乡镇（街道）区划调整的原因，2022年3月浙江省民政厅下发了最新革命老区认定通知，共确定515个革命老区乡镇（街道），其中最多的是丽水市136个，其次是温州市125个。而浙江省的浙西南革命老区是中国12个重点革命老区之一，国家明确纳入革命老区规划范围的是丽水市全域和温州市的永嘉县、文成县、平阳县、泰顺县、苍南县。1935年至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就浙江如何率先打造成为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先行区，本文在深入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一、夯实红色产业，提升革命老区发展动力

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培育内

生发展动力是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产业培育扶持力度，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新兴产业，在符合条件前提下，要优先向老区安排；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要优先向老区引导。”我们要抓住有利条件，培育壮大革命老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新动能。

培育优势产业，推动绿色发展。要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革命老区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农业、种养殖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发力，增强革命老区产业“造血”能力。要筑牢农业基础地位。要在保障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基础上，以筑牢农业基础为导向，整合要素资源，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要加快突破农业全产业链。实践证明，农产品不仅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重要的产业资源

和工业原料。要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加快产业主体培育，着力打造从“田间”到“舌尖”、从“地头”到“餐桌”的农业全产业链体系。要创建集产业示范、创意农业、农耕研学等优势特色产业和功能于一体的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积极探索“农业+休闲康养”“农业+乡愁文创”等方式，激发“三农”活力，着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多样化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示范点，大力实施产业促振兴行动，全面推进现代农村产业发展。要建立结对帮扶联结机制。通过与发达地区的结对帮扶，创造性地将发达地区的园区建设与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与融资平台转型相结合、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相结合，支持革命老区发展“一县一策”、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园区标准厂房等，推动龙头企业与革命老区建立起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老区百姓更加便利地共享发展成果。

坚持生态发展，探索“两山”转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始终把生态建设作为革命老区的立身之本。要创新两山互动机制。勇于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路径，建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

相互促进机制，创新推行“两山银行”，为已确权的土地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产权，开展抵质押贷款业务。创新开发林业碳汇资源，启动林业碳汇交易，从“山耕”到“山居”，从“砍树卖钱”变为“养树赚钱”，从卖“山头”变为卖“风景”，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供有效载体。要发挥老区生态经济效益。要依托生态资源和丰富的红色资源，通过生态旅游和招商引资，将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盘活资源资产，进而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使经济效益和生态保护有效结合，帮助集体和农民增收。通过将红色文化元素注入生态农业，用红色文化吸引人，用绿色资源留住人，打造出一条集红色教育、生态农业、观光采摘、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旅游富民特色之路，助推老区高质量绿色发展。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确保老区生态创造者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补偿，确保农民在建设青山绿水过程中能提高生活水平，让他们更乐于保护和维护好生态环境。继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推进农村产业发展，助力老区乡村振兴。

做强数字电商，助力产业创新。电子商务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的便捷，还有发展的动力和富裕的希望。要持续推进电商发展。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必须将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结合起来，在电商产业中，政府要当好引路人，在制度创设、人才引进、基础设施配套上下功夫，进行光纤改造，实现村村互联网宽带全覆盖，最大限度激活各类市场资源，切实培育电商发展的良好生态。要全力做好物流服务，在镇街设立收发中心，村社建立快递揽收点。要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浙江省首批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县为契机，围绕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要面向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发起成立“红色旅游数字联盟”，在供给端搭建红色旅游数字化发展的协作平台。引导革命老区旅游景区开发数字化体验产品并普及景区电子地图、线路推荐、语音导览等智慧化服务，推出手机App服务功能、红色版“同程全域通”，以现代化技术全方位展示红色旅游目的地，以满足新时期红色旅游市场趋势的变化。要注重开发新

产业、新业态。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依托自身电商平台优势，开发电商直播，把老区的特色产品“送入云端”，通过互联网社群营销、直播营销、平台带货等多元方式带动沿途民宿、餐饮和农土特产品销售，持续深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并在文旅创新、产业增值、乡村经济等多方面，为更多红色旅游目的地搭建平台，增强造血功能。

二、筑牢红色根基，改善革命老区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落后，是阻碍革命老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面对浙江省公共设施基本呈现“城市—县城—建制镇—乡驻地—村庄”梯度递减的特征，要紧紧抓住老区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关键”，加快补齐老区基础设施短板。

改变“老面貌”。老区振兴，交通先行。要优先支持革命老区铁路、公路、水运、机场、水利、能源等综合交通体系互联互通建设和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加快建设纵贯革命老区的高铁主通道，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实现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全覆盖，织密交通网，让红色沃土铺就条条惠民路、致富路。

换上“新衣裳”。有条件的地方，要通过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撬动信贷资金等创新性举措，对全村民居外立面进行统一改造，集中解决村级道路硬化、农村危旧房改造、校安工程、农村安全饮水、生活垃圾处理、雨污分流等农村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问题，大力提升老区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服务事业，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景象成为过去式。

提升“新品质”。在推进红色旅游品质升级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内部道路、步道、标识、停车场、充电桩、公共厕所、消防安防、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推进“互联网+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促进红色主题餐饮业、住宿业向品牌化、规范化、便利化转型升级。要继续加大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三、用好红色资源，推动革命老区乡村旅游

推进革命老区振兴，“红色资源”是一个重要的“撬动点”。要抓好革命老区精神传承、红色资源开发

与利用，让革命老区的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要加大革命文物和红色资源保护力度，开展革命文物资源专项调查和定期排查，全面摸清革命老区革命文物资源家底和保护需求，将革命文物资源资产使用和管理情况纳入国有资产报告。发挥老区革命遗址数量众多、资源丰富的优势，实施革命遗址遗迹、名人故居、历史文献修缮保护工程，推动红色资源有效传承。深入挖掘内涵、稳妥建设红色纪念设施、创新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加强革命老区重大纪念设施项目建设管理，合理开发特色国防军事旅游产品，积极打造精品红色旅游演艺作品等。要突出革命文物的展示利用，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成为美丽乡村的亮点和灵魂，成为红色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生研学课堂。对红色资源的挖掘应注重从青少年的视角出发，赋予红色故事以当代意义，将这些故事与青少年学生日常关注的问题相结合，从而激励他们勇于面对并克服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要进一步提升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吸引力，引入专家团队、教师团队、社会志愿团队，为各群体提供

更具有针对性的导览讲解服务、课题研究指导等。通过宣传讲解、展示展览、拓展演绎等方式与途径，使红色资源中树立远大理想、克服重重困难、接续奋斗前行的励志追梦故事广为传播，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精神食粮。

优化红色旅游发展格局。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是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的目的。探索共同编制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突出打好“红色”品牌，推进“旅游+”，形成“红色引领、产业融合、旅游兴旺”的红色旅游发展新格局。要建立革命老区红色旅游重大项目储备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红色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频共振的积极作用。要提升红色旅游规范发展水平、深化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融合、促进革命老区城乡区域协调、推进红色旅游适度多元发展，从“红色旅游+文化产业”“红色旅游+教育产业”“红色旅游+农业产业”“红色旅游+健康产业”“红色旅游+体育产业”入手，助力老区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发挥红色辐射带动力量。要与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融合，与改善群众生活条件、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有效衔接。丰富红色旅游产品业态供给，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行，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按照“以红为魂、红绿相间、多产融合、全域旅游”发展思路，把红色旅游作为富民产业，常抓不懈，真正让红色旅游兴一方经济、带一方百姓。要着力突出红色主题，坚持红色资源的红色属性和红色品质，强调革命文化内涵、历史内涵，确保这笔宝贵的历史财富能够传承后世。要秉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力求让红色经济成为推动当地产业及经济发展的“红色力量”，为革命老区的全面振兴注入鲜活动力，实现老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整体提升。在挖掘红色文化内涵、聚力发展红色旅游时，我们还要致力于开发更多游客喜闻乐见的体验类项目，推出更多定制化红色旅游产品，不断提升红色文化与旅游的吸引力。旅游企业可以针对青少年研发红色教育产品，结合“双减”政策的实施，增设红色教育主题课外活动，进一步加强面向青少年的红色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四、完善红色政策，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多年来，中央频出利好政策，对革命老区支持力度持续“加码”，凝聚着中央的深情大爱，让革命老区迎来发展新机遇，为老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研究出台配套政策。当前既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窗口期、关键期，又是攻坚期、考验期。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文件，要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市、县，全力承接好、落实好国家政策。要进一步研究政策，按照“全面顶格、能出尽出、精准高效”要求，尽快研究出台我省各条线上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贯彻落实意见。全面落实老区振兴各项政策，一项不漏、一点不漏，推动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让广大革命老区早受益。围绕革命老区转型升级和振兴发展，指导有关市、县研究提出拟向国家争取支持的事项，同时做好重大项目的谋划储备工作，争取更多事项和工程项目纳入国家专项规划、相关政策文件或重点项目库。

积极对上争取政策。脱贫摘帽

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脱贫攻坚战打赢后，我们要争取一批革命老区市、县列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获得财政、人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集中支持，不断夯实脱贫成果，持续增强发展后劲。各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应努力实现从单一的产业扶贫转向产业振兴、从外导型发展转向内生型发展、从以城带乡转向城乡融合发展。要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扩大老区振兴的有效投资，用足用好专项债，推进重大项目早开工早见效。

推出本地特色政策。在产业发展促进上，应当利用相关发展基金，支持革命老区创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推动乡村旅游集中连片发展，打造精品民宿品牌，支持康养产业发展，鼓励创建全域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红色基因传承上，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支持革命老区立足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打造红色旅游景区和线路，完善红色旅游配套设施，指导旅游企业宣传、推介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要建立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人制度，尽量从革命后代、家属和长期从事红色文化传播等人员中评选产生，负责革命老区红色文化传播、红

色故事宣讲等工作。

五、守牢红色根脉，筑牢革命老区战斗堡垒

“红色根脉”是党在浙江百年奋斗最鲜明的底色，浙江必须厚植党的执政根基，持续建强基层堡垒，守好“红色根脉”，不断创新完善基层党建理念、机制、方法、手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塑造变革能力。

提振老区干部精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要充分发挥革命遗址、学习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和红色文化研学精品线路等作用，组织干部群众在“红色之旅”中学习党史，精选推出革命传统现场教学点，通过红色讲堂、流动党课、互动体验等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好用活丰富的红色资源，让革命先辈们的精神，化作干事创业的热情，以革命精神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我们坚信，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有了群众热情高涨的积极参与，有了党员干部勇于担当的模范引领，我们必将乘势而上、一往无前。

推进全域党建联盟建设。通过以党组织共建为纽带，在乡村振兴联合

体、产业发展相近村、重点项目所在村、毗邻区域等建立党建联盟，或采取以强带弱、以大带小等模式建立党建联盟，推进全域党建联盟建设。以组织形态创新促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基本实现党建联盟在乡村全覆盖。要强化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的统筹指导，深化联盟单位之间的交流协作，搭建资源共享、政策互惠、产品共推的交流平台和合作模式，着力打造一批党性教育阵地。

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要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最大化组织起党员、群众和各方面力量，持续选派优秀干部到革命老区村担任第一书记，专职抓乡村振兴，确保帮扶力量只增不减、只强不弱。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建立村企结对帮扶机制，通过外在推力的增加来激活内生动力。适应乡村振兴的新形势，要部署开展新一轮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行动，到2025年，实现年收入20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全覆盖，年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行政村达到50%以上。

建强基层“领头雁”队伍。要坚持聚焦老区乡村振兴需要，持续优化领导班子结构，选拔熟悉产业发展

等方面的干部进入县乡领导班子，增强班子整体能力。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市县干部主要精力要放在“三农”工作上，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基层党员干部，尤其是村干部队伍是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2021年浙江高质量完成村社换届，班子结构明显优化，乡村回引人才2.06万名，占比从9.7%提高到16.1%；致富带头人进村班子9.85万名，占比77%；全日制大学生进村班子2.1万名，覆盖70.6%的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是乡村振兴的“头雁”。要创新基层党组织书记专业化、职业化管理，每年动态调整一次，确保“有进有出、动态平衡”，确保优秀干部在农村“留得住”“稳得住”“干得好”，赋予乡村振兴更强动能。下一步，浙江要持续优化基层党员干部整体素质，全面实施“领雁计划”，深化推行“导师帮带制”，组织实施党员带头致富、带领创富、带动共富“三带行动”，扎实开展新时代基层干部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主题培训，凝聚起基层党员群众携手奔向共同富裕的强大

力量。

突出人才政策支撑。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着力构建“物质激励+台阶激励+精神激励”的正向激励机制和长效引导体系，激励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施展才华、大显身手。要建立高端人才专家库，加快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换代和乡土人才科技素质提升，构建贯穿县乡村的专家、农技人员和乡土人才共同推进乡村振兴的高效立体人才支撑体系。要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政策支撑，吸引一批人才在乡村振兴主战场贡献聪明才智，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积极开展“双招双引”活动。要积极培养乡村本土人才，引导在外乡贤回乡创业，不断壮大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支持选派科技特派员到乡村开展农业产业技术指导，培养一大批适应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需要的“土专家”“田秀才”，增强农村发展“内力”。

〔作者单位：中共平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

《财计上》中叶适的治国理财思想

◇ 张声和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永嘉人，后居温州城区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于淳熙五年（1178）中榜眼，历任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官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国子司业、知泉州、兵部侍郎等。叶适所代表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

叶适有关理财与财富聚敛的论述非常丰富，主要思想集中在《财计上》《财计中》《财计下》《财总论一》《财总论二》等文章之中，今选择《财计上》作简要释读：

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

而徒有仁义之意，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小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资，通“质”），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虽明知其负天下之不义，而莫之恤，以为是固当然而不疑也。呜呼！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而上之任用亦出于小人而无疑，民之受病，国之受谤，何时而已！

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壅，壅塞、积滞）遏（遏，抑止）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

满足而不匱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

当熙宁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为君子者，又从而争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为利也。”其人又从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圣人之意，六经之书，而后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辩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

夫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賒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国服，为国家服务）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为也。何者？当是时，天下号为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畔，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而取于常数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与则谁与之！将无以充其用而遂与之也？则民一切仰上而其费无名，故賒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

者为息。且其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非周公谁为之？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

夫学周公之法于数千岁之后，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谓周公不为是法，而以圣贤之道不出于理财者，是足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为之，同不以自利，虽百取而不害，而况其尽与之乎？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使其后顿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财，亦可得而略计矣。黄帝、尧、舜以来，财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几也？秦汉之后，创取于民，后世日以增益，今其弃而不求者几也？天下之遗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几也？抑犹有上之所未敛者乎？抑已尽敛而不可复加欤？然则有民而后有君，有君而后有国，有君有国而后有君与国之用，非民之不

以与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说？今之理财者，自理之欤？为天下理之欤？父有十子，阖其大门，日取其子而不计其后，将以富其父欤？抑爱其子者，必使之与其父欤？抑孝其亲者，固将尽困其子欤？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财者欤？然则今之开阖、敛散、轻重之权，有余不足之数，可以一辞而决矣。奈何以聚敛为理财，而其上至于使小人？君子以为不当理财，而听其绝而不继？若是者，何以为君子哉！

叶适特别强调国家理财的重要性和实效性，并特别提出“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财计上》的观点是叶适经济思想的重视组成部分。

南宋王朝与历代其他王朝相比，国家生存状况相对是比较紧张的。对外战争中屡遭失利，只能偏安一隅，国库无财、社会矛盾激化，陷入积弱积贫的恶性循环中。要解决南宋社会的种种实际问题，实现富国强民，首先需要解决财政困境，用良性的理财运行作支撑。在这种形势下，叶适与永嘉学派的学者特别强调理财的重要意义，《财计上》强调“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针对财政混乱的状况，叶适以古喻今，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若

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这些观点，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尝试将功利、务实思想整合到传统儒学义理之中，并以此指导治国理财活动，解救时代的困局。

叶适的理财思想，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而绝非聚敛的“务以多取为悦”。执政理念应该是：理财者是与天下为利，是为天下黎民服务的，君子不但不应避理财的名义而不去理财，而且应该积极承担和履行理天下之财的责任；聚敛则是政府官吏的自利，即政府或官吏与民争利。总之，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不自利”而“为天下理之”即谓理财，“为自利”或“自利之”则是聚敛。理财是为国家办财政，而不是为君主个人办财政。

《财计上》辨明了“理财”与“聚敛”的本质区别：“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

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叶适认为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是理财，取之于民而用之于自利是聚敛。他从王安石变法中的一场争论入手，通过对周公泉府之法的深入剖析，阐明了“是法”只适用于当时，而今世异时殊，使周公居今之世，“固不行是法矣”的道理，从而对理学家们的“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以及今之“以聚敛为理财，而其上至于使小人”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此篇着力以实证分析来印证概念的辩证，从而达到了为理财正名的目的，论证了君子不当避理财之名，关键在于为谁理财和由什么人执理财之权。在文中，叶适提出，“然则有民而后有君，有君而后有国，有君有国而后有君与国之用”，此句道尽了千百年来治国理财的本质，即“为民理财”。

叶适对理财与聚敛的区分具有双重意义：一是针对现实运作中理财与聚敛的混同，指出当时的统治者是借理财之名行聚敛之实，与民争利，于国于民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此提出了清除苛捐杂税、减免经总制钱的改革主张；二是从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揭示理财与聚敛的区别，澄清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理财的模糊概念，

具有理论方面的突破。

《财计上》分析道：“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其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叶适说，持“君子不言利”思想的人，他们根本不懂“理之”与“取之”的区别，“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对于理财，叶适解释说，理财异于聚敛，他支持前者而坚决反对后者。他以大禹和周公的例子，述说君子缘何应该善于理财的道理：“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充分肯定讲求财政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善于理财者才是圣君贤臣。

国家理财方针，历代均有争论。《财计上》认为，自先秦开始，士大夫中就流行一种偏见，认为讲求财政就是言利，从事理财就是聚敛，因此“使君子避理财之名，小人执理财之权”。司马光在反对王安石时指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也”。这些不同观点的言论在思想上造成了财利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形成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治国理财思想。这些重义轻利的思想，在历史上

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一是造成了人们普遍地不敢名正言顺地追求财利；二是导致许多人即使求财也须用道德之名来掩盖。特别是有一些士大夫，他们讳言财利，并常常因自己持有的不敢理财或不屑理财的态度而自居道德的高地。

叶适指出正确的国家理财方法是：“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以大禹、周公为例，鼓励统治者效仿之，反对与民争利和取诸民的做法。

永嘉学派自薛季宣以来，一贯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薛季宣在《大学解》中说：“《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聚敛之臣，不知义之所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之民也。民争利而至于乱，则不可救药矣。所见之小，愚知利义之和哉！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以共论生财之道。”叶适构想的理财方针

是，理财可以不必取之于民，并对秦、汉以后“创取于民”“取诸民而供上用”表示非议，他的《财计上》中发挥杨雄的“为其父而榷其子”的譬喻来反对“取诸民”的财政方式：

“父有十子，阖其大门，日取其子而不计其后，将以富其父欤？抑爱其子者必使之与其父欤？抑孝其亲者固将尽困其子欤？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财者欤？”叶适深入浅出的举例和比喻，对于国家理财与民众生息相融，以父子关系来相比，真可谓经典。

《财计上》只有1500多字，却能从中看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所持有的功利主义思想，既源于中国古代治国理财思想，又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同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叶适的治国思想与人文性格和苏轼有一定相似之处。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评价苏轼说：“轼谓‘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终不言十年后当立何事。若神宗罢安石而听轼，非安于不为而止者，亦未知轼以何道致其君，此不可不素讲也。”这观点颇具见地。叶适认为，政事有千头万绪，理财思想确立，民生保证，才是重要的环节。

（作者系《温州市志》主编）

忠为立身之本 义是涉世之道

——瑞安忠义文化形成及传承研究

◇ 谢公望

由于永嘉学派的承前启后者陈傅良和集大成者叶适都是瑞安人，所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瑞安是“永嘉学派”的主要发祥地，而忽略了早在三国吴黄武年间（222—229），瑞安人蔡敬则赐谥“忠义”后，瑞安民间便逐渐形成以“忠”为立身之本、以“义”行普世的“忠义文化”。效忠朝廷的叶一源、陈寿孙、黄养正，忠贞不屈、誓不做二臣的卓敬、林增志、李维樾，忠于民族大义、敢于公车上书的陈虬、周予同，忠于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林去病、金铨三、全学梅等等，千百年来瑞安人世世代代传承并谱写着忠义文化。

一、瑞安忠义文化的形成

瑞安忠义文化，滥觞于先贤名节。先贤就是蔡敬则，他不仅开创了瑞安、缔造了瑞安，并为瑞安带来了忠义文化。

根据清·乾隆《瑞安县志》及有关《忠义庙记》等史料记载，蔡敬则大约生于东汉元嘉元年（151），卒于三国曹魏黄初二年（221），地道的瑞安本土人。他出生时有颖异，少时以气节自负，弱冠通经义。东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应举孝廉，授南阳令，后弃官归隐。时值四方盗起（张角、黄巾起义），蔡敬则率义兵捍寇有功，授东部都尉，立县署于邵公屿（今瑞安海华大厦附近），筑城郭以卫民安，浚河道便民生息，建县署以听政。任上，发布政令明肃，境内大治，省刑节用，年谷屡丰。躲避逃荒、四散外地的百姓闻风而归，生齿日滋。朝廷嘉奖其政绩卓著，进爵为安乡侯。三国鼎立，瑞安为孙吴属地，蔡敬则解甲归田，息影农耕。当时瑞安城郊集云山一带有猛虎昼出食人，郊区村民人心惶惶。蔡敬则挺身率众，深入虎穴屠之，虎患遂除，

百姓感恩戴德。他死后，民众自发在其公署立祠祭祀，并在周岙其墓旁，建搏虎祠纪念。三国吴黄武元年（222），赐谥忠义应顺辅正，列爵为王。后来，老百姓将邵公屿都尉署衙改称为“忠义庙”，每年中秋节都要在忠义庙及其墓地举行祭拜活动。

千百年来，忠义庙屡毁屡建。明正德年间（1506—1521），曾任经筵讲读（正二品）的邑人周令所撰的《忠义庙记》：“忠义庙神姓蔡，讳敬则，东汉永宁人，生有异质，少负气节，弱冠通经义，先是顺帝永和甲申，分章安之东甌乡为永宁县，置东南二部都尉。灵帝光和间，神应举孝廉，授南阳令，后弃官归隐。值四方盗起，率义兵捍寇有功，授本地东部都尉，立县署于邵公屿，筑城郭，浚河道，号令明肃，境内大治，进爵安乡侯。省刑节用，年谷履丰。闽越避地者，悉归焉。神扩土，别氏族而分处之，生齿日滋。迨汉鼎分，江东尽为吴地。神从兵归农，退处闲散。对猛虎昼出食人，神拘虎讯伏，之归，即立地而成神焉。黄武初，赐谥忠义，寻加应顺。晋永宁辛酉，建伏虎祠。是夕雷雨大作，林木悉拔，因是庙毁，复成。县尝有冤狱，其家诉于神，昼摄受贿吏，跪庭下，悉吐其

实，郡觉，以其异，闻于朝，加封辅正王。勅入乡贤名宦列祀。太宁癸未，郡请郭景纯师，相度阴阳，议更改之，师登城观毕，叹曰：非神人不能迁此城，议乃寝。唐光启中，命郡邑立五圣大帝、灵顺行祠，割神庙址东北之半，而比肩焉。宋大观时，吕令讳勤者，装塑大帝像，合而祀之。洪武二十三年，取勘会典应祀之列，有司以神之异迹闻诏，例于中秋望日致祭，与永嘉东甌王一体，崇祀会议册，祭品银二两，岁于里甲地丁丙应取办备载赋役全书。弘治戊申，邑令高君宾，以庙逼，改迁崇福院废址。正德癸酉，里人重盖神庙，以侯封忠义辅正王，额曰：忠义庙。”

“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经典思想里，“忠”指的是尽心竭力为人办事，当时并不分对上与对下。正如孔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里的“义”则是指“事之宜”，意谓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礼记·中庸》指出：“义者宜也。”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得很明确：“行而宜之谓义。”先秦以后，随着封建君主制意识形态的确立，“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而“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

类人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汉代以后，随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忠义”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尽忠，也能对同类人讲义。世代瑞安人对蔡敬则进行顶礼膜拜，正是人们敬仰他对朝廷忠贞不渝，对老百姓敢于担当的凛然义气。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写有：“从来名贤殁为神，各视平生所建竖。”蔡敬则死后，百姓在其署衙建庙奉祀，是为了纪念他忠义名节。而在漫长的俗神崇拜岁月里，不断地通过富有本土忠义文化精神内涵的民间造神运动，不断进行神化，使蔡敬则端坐神坛，从人成为神。到了晚清，孙锵鸣撰述《重修忠义庙碑记》时，蔡敬则不仅显灵瑞安城堞，并昭示北门守卒有内奸，使得孤城获全，百姓转危为安。蔡敬则正是被这种造神运动不断神化，使得他的忠义名节慢慢凝聚成为民间信俗文化。这种信俗则成为承载体，世代传承特定地域上的特定文化。民俗文化的特点，除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域性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民俗化人于细微处，影响深远。人们在持续的祭祀等民俗活动中耳濡目染，使得忠义文化深入人心。于是，瑞安人从青少年时期，

便在脑海中埋下了忠为立身之本、义是普世道行的人生理念。

二、瑞安忠义文化的传承

翻开清·乾隆《瑞安县志》卷八“人物”篇，便有“忠义”之目。录载人物，继蔡敬则之后，有唐代的叶一源，宋代的薛良显、陈寿孙，元代的彭庭坚，明代的卓敬、黄养正等17人。

忠烈侯叶一源。叶一源（约600—645），字九江，祖籍括州松阳，其祖父迁居瑞安城东郊。隋大业十二年（616）唐李渊父子率大军围攻京长安。次年，叶一源闻李渊军已攻克长安，遂聚兵千余，投奔李渊，后被任命掌管军中机密。李渊建立唐王朝后，授叶一源福建道节度使。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高丽（今朝鲜）人盖苏文兵变，决定亲征高丽。檄令叶一源随副总管薛万彻同往。是年初，盖苏文军负隅顽抗，整日不能攻克其守城，唐太宗忧形于色。叶一源上前慨然曰：“主忧臣辱，幸生可乎？”自告奋勇，单骑冲杀高丽阵营，斩敌20余人。大军见他率先冲杀，便一拥而入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州），战斗取得胜利。不料叶一源驰归时身中流矢而殒命。唐

太宗闻报，辍食哀悼，下诏于所居之里立祠祭祀，追谥“武义侯”。武后时加封为“忠烈侯”。

忠直为皇帝所称赞的许景衡。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因出生于瑞安白门里横塘村（今瓯海丽岙街道姜宅村），撰写有《横塘》诗，结集称《横塘集》，后迁居东山。尊为“瑞安四贤”之一。又与周行己、蒋元中、刘安节等9人被合称温州“元丰太学九先生”。

许景衡于北宋元祐九年（1094）中进士，历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一生三起三落。徽宗朝，针对王黼、蔡攸、蔡京等，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动用几十万民夫启运“花石纲”劳役，营造皇家园林。他直言上书皇帝，痛陈“财力匱乏在节用，民力困弊在恤民”，要求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劳役，因而为王黼等人所不容，被排斥出京。钦宗即位后，以左正言召，不久改任太常太卿兼太子谕德，迁中书舍人。因站在以李纲为主帅的主战派阵营，随着李纲被罢相，主战派倒台，又累及他被罢官。南宋建炎元年（1127）高宗登基后，以给事中召，入朝后任御史中丞。十一月守尚书右丞。未几，擢为执政。建炎二年（1128）五月，因为宗泽辨护，

得罪黄潜善、汪伯彦等人，被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不久，在赴杭州途经瓜洲时得喝疾（中暑），及至京口（镇江）而卒。赠中奉大夫、瑞安县开国男，谥“忠简”。

宋高宗曾多次称赞许景衡忠直，敢于实话实说。因言：“朕自即位以来，执政中张恣第一，忠直至诚，遇事敢言，无所回避，其次则景衡。若郭三益，则善人而已。”

大义面前敢于担当的娄寅亮。娄寅亮（约1088—1166），字陟明，北宋政和二年（1112）进士及第。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以文林郎任上虞县丞。当时正值高宗独生子元懿太子因故而薨，南宋王朝后继乏人，高宗按昭穆顺序拟从太祖七世孙“伯”字行中诏选立储。娄寅亮出于对南宋王朝的赤胆忠心，于建炎三年（1129）率先上疏：“欲望陛下于‘伯’字行下，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臣本书生，白首选调，垂二十年，今将告归，不敢缄默。位卑言高，罪当万死，惟陛下幸赦！”疏入，帝读之，大为叹悟。

娄寅亮因疏请有功，被高宗调入御史台擢为监察御史，从九品县丞地方小吏，升迁为从七品京官，可喻连升三级。然而却被主政的右丞相秦桧所恶。以“匿父丧不举，下大理鞫问。”有说娄寅亮死于狱中，也有说被遣还乡途中歿于山洪。《宋史》和瑞安历代县志都为其立传。其忠心可鉴，为后人景仰。

义不草诏的陈傅良。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世称止斋先生。自幼勤学苦读，年未二十即文名擅天下。南宋乾道六年（1170）入京师太学。八年登进士第。淳熙六年（1179），任福州通判，绍熙元年（1190）改任浙西提刑，次年回京奏事，留在朝廷任吏部员外郎，四年升任权中书舍人（替皇帝草拟诏书的官员）。当时有个太监叫陈源，依仗皇帝宠信，在宫中专横跋扈，皇帝先后两次要升他为内侍押班，陈傅良都拒绝草拟升迁陈源的诏书。陈傅良与朱熹开始并不认识，后因学术上互相切磋，就以书信的方式开始神交。绍熙二年（1191），陈傅良遣弟子曹叔远问学朱熹，两人也还未谋面。直到绍熙五年（1194）九月，两人才能在杭州六和塔初次见面。就是在这年冬天，赵汝愚与韩侂胄两派党争升级，

韩侂胄专权，欲贬斥朱熹在外宫观，陈傅良连疏：“朱熹三朝元老，难进易退，欣慕圣明，幡然一出，天下以为得人，内批之下，臣不敢书行。”大义凛然，拒绝草拟诏书。也因此被御史中丞谢深甫参劾，指责他与朱熹“伪学”集团有关，而被罢官。

忠魂可嘉的陈寿孙。陈寿孙，南宋宝祐元年（1253）进士。生性刚介有志，不畏强御。历任直龙图阁、福建提点刑狱公事，贪官污吏闻风畏惧，纷纷离职。再后来入朝，因与贾似道争议盐法事，被参劾辞官归里。南宋景炎二年（1277）五月，元兵大举进攻瑞安，陈寿孙率乡里义兵抗元，在东门白岩桥利用民居住宅的门户、家具筑栅栏抵御，战败被执。元将劝他投降，效力元朝，他怒目圆睁称：“我是大宋宪臣，怎么会顺从你们！”并厉声大呼“何不速杀我也！”元将佩服他忠义气节，命在狱中缢死。

忠贞不二的卓敬。卓敬，生年不详，字惟恭，仙降卓岙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授户部给事中。当时他见皇子诸王的服饰、车骑、仪仗等方面都类同太子，便不顾结怨诸王，向朱元璋提出建议：“京师天下视

效，礼法纲纪攸先。闻诸王在禁中服饰尚有拟太子者，何以令天下乎？”必须健全皇室制度，树立太子的权威。朱元璋很赞赏他的提议，对他更加器重，擢升为户部侍郎。朱元璋死后，因太子朱标已死，由朱标的儿子朱允炆继帝位。改元建文，是为明惠帝。仁弱的朱元炆听信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翰林院侍讲方孝孺削藩的建议，先后执周王朱，削爵为民；岷王朱楩不法，遂废为民；湘王朱柏，制伪钞合家自焚死；齐王朱榑废为民；囚代王朱桂于大同。这期间，卓敬亦向朱允炆密疏“燕王雄才大略，酷似先帝，顾其为人，必非在人下者，且北平天下都会，地方广逸，士马精强。今宜及其未备，徙封南昌，则羽翼既去，变无从生。”未被采纳。建文元年（1399）7月，燕王朱棣在多位藩王被削被废后，打着“清君侧”旗号，在北平起兵，长驱南下，经四年战争，攻陷南京，史称“靖难之变”，夺取了帝位。先后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朱棣对卓敬密疏朱允炆“徙燕”于南昌虽然十分恼怒，但怜惜他的才能，希望他效忠于自己，多次派人到狱中劝说卓敬能够改弦易辙移忠朱棣。卓敬涕泣回答：“人臣事君，有死无二。”朱棣

见卓敬仍不改初衷，回心无望，遂下令将他诛杀并灭其三族。尝叹曰：“吾国家养士三十年，不负其君者，惟卓敬尔！”

削发明志、誓不做二臣的林增志。林增志（1593—1667），字任先，号念庵，瑞安县城人。少年时颇有抱负，崇尚卓敬等忠烈先贤。明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时年三十五岁。历官蒲圻县令、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学士、经筵日讲官、会试同考官及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晋少詹事。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起义军攻陷京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林增志只身逃离北京，南归金陵，打算与史可法反清复明。因与明皇室福王政权主政马士英、阮大铖等政见不合，随即赴福建建宁府，旧明皇室唐王朱聿键所立的南明隆武政权，从事抗清斗争。不久清军入闽，南明政权为其所灭，为躲避清兵搜捕，出奔福建沙县吕峰山削发为僧，持节出家，改名行帙，法号法幢。次年秘密返里，避居佛门。清军占领瑞安后，他曾被捕，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清顺治八年（1651），成为皇太极左膀右臂的范文程，因慕林增志的才识，将他推荐给摄政王多尔衮，征召其入京。林增志拒不接受，并以自杀

明志，誓不做二臣。后经其妻作书劝说，才以僧服参见。清廷委以官职，他以皈依佛家为由，坚却不仕。清廷怜惜其意志坚毅可嘉，遂将其放回。此后，隐居瑞安城内虹桥，杜门谢客，专事著作。

清流巨子、铮铮谏臣黄体芳。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瑞安县城小沙堤人。清同治二年（1863）中会元，殿试中二甲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侍讲，福建、山东学政。光绪二年（1876）还京与同榜张之洞供职翰林院。光绪三年（1877），山西、陕西、河南、直隶诸省发生罕见旱灾，黄体芳与张佩纶、宝廷等人接连上书，要求广开言路，以拯时艰，促使朝廷下诏“求直言”。其中尤以他与张佩纶、宝廷及张之洞四人最有名气，被时人合称“翰林四谏”。俄国出兵占领伊犁后，清政府派完颜崇厚出使与俄国谈判，于光绪四年（1878）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黄体芳获悉后，出于民族大义，效忠国家的满腔激情，疏劾崇厚擅自与沙俄政府签订《里瓦吉亚》条约，割让伊犁以西大片领土给俄国的卖国行为。连上《请飭枢臣妥筹审处崇厚疏》《和议定约后，杀崇厚以挽狂澜疏》，促使废除崇厚与沙俄原来签订

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绝食表忠、大义凛然的洋状元项骧。项骧（1880—1944），字渭尘，号微尘，瑞安县城人。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接着又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获硕士学位。宣统元年（1909）毕业回国，次年参加清廷留学生殿试，得第一名，时称“洋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民国元年（1912），项骧任财政部首席参事，部制章则多出其手。1932年，上海及东南各地发生火灾，哀鸿遍野，他致电美国同窗好友、时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呼吁赈济，获得救助，上海各大时报对此大加赞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家乡带头发起组织“反日会”，参加大操场抗日救亡大会，登台演说，怒斥日寇暴行，当场捐助100银元和20美元，又发起举办书画展，将义卖所得捐作抗日经费。1941年4月19日，瑞安城沦陷时，敌伪威逼利诱拉他任维持会会长，遭到他“临难不屈，严词拒绝”。1944年9月，日军第三次占领温州，进逼瑞安、平阳，居民纷纷疏散离城，项骧以衰病之身，不忍再见家乡沦于日寇，遂决意绝食，于当年11月4日逝世。

三、瑞安历史上的各种义行义举

瑞安忠义文化，自蔡敬则黄武初被赐谥“忠义”，至南宋经八百多年传承、演进，随着永嘉学派的兴起，忠义文化成了永嘉之学的重要元素。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倡导“义利并举，经世致用”，提出“崇义谋利”的主张。他批评汉儒董仲舒的名言“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言“疏阔”，未免有轻视功利。同时，反对当时的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把义和利、理和欲截然对立起来，以义理来排斥功利的观点。对于事功而言，自古就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认为这分明就将“义”和“利”对立起来了。并指出，认识要从“利害”入手，然后才能知“利”之所在，去“害”才能见“利”。只讲义而不计“利害”，是空言。从“害”到“利”以明天下之大“义”，才是实谋。他主张应“以利除害，以义约束，规范利”，故此提倡“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并声言“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他认为，“义利观”的根本是“义、利之本”。因此，必须“崇义谋利”。于是，这种讲道义又敢言功利的思

想，逐渐成了永嘉之学的元素，成为瑞安忠义文化的一大资源。千百年来，就是在这种学说、思想的风细雨滋润下，瑞安大地上又出现了义塾、义渡、义冢、义仓等各种各样的义举。

（一）义塾。南宋开始，瑞安出现义塾。

凤冈书塾。南宋乾淳年间（1165—1174），为曹村长者曹绛所创。曹绛，字思厚，别号石室居士。遇年成歉收，便带领族人减定里中谷价。尝著《家训四戒》：“处心无妄想，则终身安泰；处乡无妄交，则终身不陷于不义；于人无妄语，自然信义孚于人；于财无妄求，不致生事启他患。”所创凤冈书塾，延聘名师教授族中子弟，造就人才二十余人。乾隆《瑞安县志》卷二《建置·学校》：“凤冈塾，在来暮乡凤冈，宋曹绛建，延儒设教后一门登第者二十四人，如叔远、幽，元发辈，皆为世名儒。”曹叔远（1159—1234），登绍熙元年（1190）进士第，官终徽猷阁待制，卒谥文肃，《宋史》有传，是永嘉学派重要学者。曹幽（1170—1249），登嘉泰二年（1202）进士第，成为“嘉熙四谏”之一，其诗作《暮春》被选入

《千家诗》。其生平在《宋史》曹叔远传附载。

南山书塾。稍凤冈书塾后，为郑士华所建。乾隆《瑞安县志》卷二《建置·学校》：“南山塾，在帆游乡南山，宋郑士华立。”同书卷八《人物志·隐逸》：“郑士华，居帆游乡南山里（今塘下镇），读书尚义，动必以礼。隐居不仕，尝筑书塾于家，延名儒以教子弟，寿一百十岁。”

义学。乾隆《瑞安县志》卷二《建置·学校》：“义学，皇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奉宪檄，于宾阳门内立义学，捐俸备馆谷，延师训子弟，复月课，亲校鼓励之。”又据《瑞安市教育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知县邬铨兴办义学，同治年间（1862—1885），全县部分书院如玉尺书院、聚星书院、萃英书院、岱山书院、学渊书院等曾一度改为义学。

义冢。旧社会，常有穷苦人家无力安葬死去亲人的尸体，或有光棍汉穷困潦倒，暴毙于荒郊野外，还有瑞安临海，遭遇海外而陈尸滩涂的死难者尸体。据乾隆《瑞安县志》卷二《建置·义冢》：宋崇宁间（1102—1106）置漏泽园，绍兴间（1131—1161）立义冢。明洪武三年（1370）

命所在官司择附近郊外宽闲山原田地设为义冢。嘉靖间（1522—1565）刘令畿查置21处。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邑令范永盛捐资复置一处，并撰《募建义坟文》，中有：“俾有主无主，咸得向此依归；任若智若愚，毋使浪生分别。身安入土，骸掩长眠，不须缘字朱函，但免凄风咽露。”计有四都徐坑，六都塔山、窄坑，七都鱼潭屿、西山根，十都华表山根，十一都白井，十二都横山，十四都杨府庙后，十五都陈埭、宋埭，十六都李埭、高沙头，十七都瓜埠洋，二十一都花亭洋、宋水堆、河尾洲，二十五都南山、董山根，二十九都麻头关，三十都扞堂等二十多处义冢。

天王寺僧宗义，俗姓黄，小名尚义。中年剃度于城西天王寺，人称文广和尚。常率弟子荷锄埋葬荒山枯骨，不计其数。一日语弟子：寺前有一小棺，吾见之久矣，无人为其建墓，殊足哀怜，该当葬之。遂与其弟子将小棺抬起，棺破，累累白镪（钱币）滚落，宗义见之毫不动私心将其据为己有。《瑞安市志》称：清雍正九年（1731），宗义以此银造飞云江渡船20艘，分别编以飞字号和云字号；并倡捐水田400亩、沙田30亩、涂

田20亩以资义渡。

李芑（1876—1927），字叔诚，云周杏垞人，廪生。科举废除后，专力诗词书画，尤精医术，被称“神手”。民国元年（1912），飞云江上游山洪爆发，南岸一带沦为泽国，水面漂浮百多具尸体，李芑参与救济，雇人打捞买棺，资助中国红十字会在项岙建百圻坟埋葬。

（二）义渡。瑞安义渡，有史所据，首开义渡先河的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陈克受等捐资制为义渡。嘉庆《瑞安县志》卷二《建置·水利》：飞云渡，在城南门外，江程六里，浙、闽要冲。元延祐六年（1319），暴风覆舟，郡守赵亲至祭江。明嘉靖间，额设官渡十只，止存其四。渡夫搁停官渡，以行私船，且揽载多人，屡有覆溺之患。刘令畿察知其弊，痛加惩创，复造官渡十只，分布两岸，每船之旁，大书渡夫姓名，各级腰牌，轮次往回，严禁需索。岁久舟坏。国朝康熙十六年（1677），民陈克受等捐资制为义渡，副将刘顺复捐俸创舟八只，范令永盛仿刘令旧法增广之。雍正初年（1722），仍藉民船济渡。乾隆八年（1743），被风漂没。飞字十号船，耆民程兆麟捐造。云字六号船，陈舜子贡生陈步青自行收葺。渡夫共二十名，每季县给工

食，每渡一舟止许载三十人，人各给钱一文，货一担亦如之，换次轮袋，毋得搀越。嘉庆十一年（1806），徐署令映台严禁重载勒索，令每人加给渡夫一文，永以为例，并行立石。又南岸倾圯，舟不附岸，乾隆十年（1745），僧云客募修。

有史可据的义渡，除城南飞云渡，还有大金竹排埠，在大金街北，同治三年（1864）建，有航船八只，日行二次。沙林渡，在下林沙洲，民国二十五年（1936）建义渡，船二只。

（三）义仓。瑞安有义仓，大约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为李孟奇所建。当时全县闹灾荒，他出谷万余石赈济救灾，永嘉饥民告急，他又出白银三百五十两易谷赈灾，并捐白银五百两于永、瑞两县建置供应局，筑义仓，将米谷三千石散救灾区。县有义仓后，可贮粮数万石，丰年则敛之，荒年则散之，以丰补歉。李孟奇，名伦，以字行，南社双峰陇头里（今飞云镇龙头村）人。《瑞安市志》卷三十三《人物》称其：热心地方公益事业，营建府县官舍、学宫、义塾、义冢及寺观多处。温州各县岁饥，前后赈施粮食万余石、白银千余两。又造飞云江义渡5艘，供给



瑞安忠义街

船夫衣食。平阳沙塘陡门建成，伦为造屋覆盖，以延长使用时间。其子信夫，亦相继为善事不绝。正统四年（1439）、八年（1443），父子先后在京领受表扬，赐宴光禄寺。朝廷并派行人黄恕旌表其门曰“尚义”。郡守何文渊撰《义门规记》为其作记。

（四）义行、义捐。随着忠义故事在社会广泛传颂，忠义文化在瑞安百姓心目中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客观行为的准则。讲究对国家要尽忠，对社会要尚义。每当地方有公益事业举行，或遭灾荒，仗

义疏财，捐资献金者自告奋勇，层出不穷。或独家担当捐建，或首倡募捐集资修建祠庙、道路、桥梁、路亭等等。查民国《瑞安县志稿》卷十《政事编·建设》，所记载的桥梁中，独家捐建的就有：城内的敢心桥（吴之翰建），北门外吊桥（郭氏重修），鱼行街永龄桥（李俊建），东门吊桥（学前林姓建），莘塍上岸前埠南镇桥（缪寿枢建），华表桥（张荣重建），场桥新瑞桥（林庆万重建）等十多座桥梁。义士乡绅倡捐募修的桥梁则不计其数。县治西的济民桥（俗称八角

桥)，是老百姓感谢蔡贤一、蔡思振父子恤贫赈饥，醵金以偿，蔡思振坚却不受，后来便将这笔醵金建了济民桥和顺民桥。笕竺桥，横跨塘河，道光年间陈步云重修。陈步云（1773—1850），字锦堂，行伍出身，因战功官至千总、参将、总兵，为人廓落豪迈，慷慨好施。为官以道义名节自励，体恤士卒。清道光年间（1821—1850），他独资重修笕竺桥。

在忠义文化传承中，还出现不少子承父志，完成其父未尽事业的例子。除了上面叙述的李孟奇李信夫父子，蔡贤一、蔡思振父子外，还有马屿上京姚用鸿、姚琮父子。民国《瑞安县志稿》卷十《政事编·建设》：新渡桥。本乡桥梁唯此桥工程最巨，横亘小港，离水二丈余，为四方往来要道。里人姚用鸿以桥面太窄，行履可危，出谋修筑，捐资二千金，工未兴而歿。子琮，助金九百元，浦西司事林熙亦助二百元，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修。姚琮（1889—1977），字味辛，马屿上京人。曾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与蒋介石同学。民国十五年（1926）任黄埔军校上校教官、校办公厅主任。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去台湾。1952年退役前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后被举为旅

台温州同乡会会长。

此外，还有捐资巨万修塘河的洪守一。洪守一（1769—1860），字灌亭，号钝人，住县城后河街，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秀才后，便无意仕进，潜心著述，曾参与《瑞安县志》编纂。道光二十四年（1844），捐银4000两，邀集胡学金、胡永锡、蔡梦兰及从甥潘森，修浚从瑞安县城东门外至与永嘉县交界帆游近40里的温瑞塘河。修筑塘路、埠头7000余丈、桥梁50余座。二年后又捐银千两，修复塘口跨塘河大桥。道光二十七年（1847），他独资修建飞云江北岸城西至礁石段塌损江堤20多处。而他所居仅五间简陋平屋，安之若素。知县孙源为其撰《重修瑞安官塘碑记》表彰其事。

除了捐粮、捐资及举办书画展览义卖的以外，还有深明大义，捐藏书的。瑞安晚清“三孙五黄”中的黄绍箕的夫人张氏，是张之洞之兄张之渊之女。深邃家学渊源和淳朴门风，造就了张氏夫人诗礼兼全、淑德谦和的大家风范。黄绍箕任提学使视学时，曾捐俸二千金充办学经费，她从无怨言。黄绍箕卧病期间，煎汤熬药，精心护侍。其情其状在她的十二首悼亡诗中倾泻无遗。“愁肠独自煮膏火，

莲漏声声恨夜长。”“桃花依旧悲人面，君在蓬莱第几宵？”读来催人泪下。黄绍箕酷爱珍本书籍，不惜花巨资购置，其藏书楼称“蓼绶阁”。1927年，在黄绍箕逝世二十周年之后，张氏夫人决定将“蓼绶阁”9195册藏书捐赠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义举，特设座供黄绍箕遗像。

四、忠义文化在革命事业中的贡献

1926年，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以下简称“温独支”）指派林去病、叶子午回瑞安发展党团组织。在党的感召下，林去病、蔡雄、林直斋、张志玉等胸怀报国之志，怀抱革命理想的革命青年，纷纷投身到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中来，谱写了一曲曲抛头颅、洒热血，忠贞报国、坚贞不屈与反革命势力顽强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林去病（1905—1932），原名宝康，字季平，以笔名行，住县城西门街。1922年毕业于瑞安中学，1925年秋由郑炯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受“温独支”委派，和叶子午一起回瑞发展党团组织。在他的提议下，将瑞安原来的进步组织中山主义研究会和宏文会合并成瑞安民社，以

形成革命合力。当年7月8日，民社正式成立。他还亲自起草《瑞安民社宣言》。他先后吸收戴义、徐泽民、郭演九、陈明达4人入党，11月，在话桑楼成立了以戴义为组长的中共瑞安小组。随着党员数量增加，经“温独支”批准，改建为中共瑞安特别支部，林去病任支部书记。1927年3月，林去病按照党组织提出“打倒土豪劣绅”的要求，在瑞安城关主持召开大会，斗争当时瑞安“四凶”之首的原商会会长鲍漱泉，掀起农民运动新高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林去病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任中共瑞安县委首任书记，与中共省委特派员郑馨一起在白门组织秋收斗争，又和张弢在塘下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中共肇平垟支部，和陈卓如共同建立中共驮山支部，和金斌三等一起发展陶山地区党组织及农民武装。

1929年4月，党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将浙江分为六大中心区域，由中央直接领导，并调派林去病担任中共宁波市委书记，不料赴任路上，在交通员张庆祥家被捕，被判3年6个月徒刑。后因同监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从宁波第四监狱转杭州陆军监狱关押。在狱中，林去病坚贞不屈，1932年4月19日英勇就义。

蔡雄（1907—1927），字思牟，塘下海安人。1922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与同学金贯真、朱维之、苏渊雷等组织血波社、宏文会等新文学研究团体，在教师朱自清的指导下，出版刊物，宣传新思想。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立不久，蔡雄就经“温独支”主要领导成员郑恻尘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不久，蔡雄接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书记。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三天，温州也发生四一五“清党”事件，陈仲雷、戴树棠、苏渊雷3人被捕，蔡雄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转入地下，继续革命活动。根据“温独支”的决定，创办《照胆报》，揭露新军阀和西山会议派的罪行。5月18日，蔡雄身带宣传品，化妆成进城农民，从海安潜回温州，在小南门上岸后，便被特务盯上，遭到逮捕。在狱中，敌人将他铐上脚镣，施行各种毒刑，折磨得遍体鳞伤，连大腿的骨头都被打断，但他始终不肯吐露党的机密，只是在招纸上写下“苦雨凄风尽血腥，钢筋铁骨冷如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绝命诗。5月23日深夜，被秘密杀害于省立十中操场。

陈卓如（1904—1932），原名顺生，又名琢如、卓儒，塘下镇驮山村人。192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师范部。1925年春，经郑恻尘、胡识因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在驮山与林去病一起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中共驮山、沙渚等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的家一度成为中共温属各县基层组织活动的据点。1928年1月，中共省委特派郑馨来瑞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要创建农民自己的武装队伍。陈卓如变卖了祖上留下的田产，凑足100银圆，除为赤卫队购置枪支外，还给每位队员配做一套黄色军装。1930年3月9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在楠溪成立。5月8日，瑞安红军游击队成立，陈卓如任队长，并率部前往永嘉枫林集中，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1932年2月23日，陈卓如临危受命，为了解决武器问题，决定潜回瑞安搜寻、筹购枪支，不料遭叛徒暗算，大腿中枪，其父及同志将其隐藏在空坟中。国民党保安团找不到陈卓如，就抓了几十个驮山群众，厉声威胁说：“不交出陈卓如，就把驮山人杀光，你们一个也休想跑掉！”为了保护驮山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陈卓如毅然从坟洞中爬了出来，大义凛然地说：“你们要抓

的陈卓如在此，赶快将无辜的群众放了，否则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了，让你们什么也捞不到！”于是保安团将陈卓如押往温州报功领赏，押解途中，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洪彦湜（1910—1939），住瑞安城关范大桥街。瑞中初中毕业后，于1930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1936年入选空军航校飞行员培训班，成为瑞安首位飞行员。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2月20日，奉命狙击敌机，洪彦湜满怀报国雪耻的心情，应命驾机冲向蓝天，在江汉上空，与来袭敌机展开殊死激战。洪彦湜牢牢咬住一架日机，向其连连开火。突然，敌机射来一排炮火，他的一只机翼受折，机身受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抱着民族复仇大义，放弃跳伞，而是当机立断，架机猛冲敌机，刹那间与日机相撞，两机爆炸火光中与敌人同归于尽。项襄为其挽诗：“一羽云霄上，胡然帝释昏。图南鹏折翼，御敌竟焚辕。天志悲诸葛，沉湘踵屈原。灵旗若仿佛，举国大招魂。”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部在南京紫金山建造了航空烈士公墓及空军烈士事迹陈列馆，洪彦湜作为空军先烈，其英名被铭刻在纪念碑上。

忠义文化扎根瑞安，世代传承。

现今，忠义文化仍然存在积极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国家和民族层面来说，有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人们就会自觉地遵纪守法，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做构建和谐社会自觉公民，成为忠于国家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觉拥护者。从社会层面来看，忠义是一种处世哲学和道德观念，是人与人之间赤诚相见、义气相待的和谐精神的内在品格。希望忠义文化的优良传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研究室）〕

参考文献：

- 1.清·乾隆《瑞安县志》，宋维远、李赐华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3月第1版。
- 2.民国《瑞安县志稿》，编纂委员会主任项葆楨，1935年至1946年版，未正式出版发行。
- 3.《瑞安市志》，主编宋维远，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第1版。
- 4.《瑞安历史人物传略》，主编余振棠，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曹湾山、屿儿山“好川文化”遗址 发掘、保护利用的思考

◇ 李岳松 李培怡

曹湾山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戍浦村。

20世纪70年代，在上戍大桥建成前，曹湾山周围的村民想要到戍浦江南岸，需在曹湾山南麓搭船摆渡外出，故原名渡头村。西麓山湾有曹姓人居住，故名曹湾自然村。山因村名，又因山体状如一只硕大的老鼠，得别名为“老鼠山”。曹湾山是温州首个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2013年5月3日，被国务院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名“老鼠山遗址”得以更名为“曹湾山遗址”，成为鹿城区首个国家级文保单位。

一、东瓯先民遗址——曹湾山、屿儿山的发现与发掘

(一) 曹湾山——瓯江流域“好川文化”聚落遗址的发掘

曹湾山坐落在藤桥上戍片平原中央，东南西三面临江，是一座由主峰



瓯江流域的遂昌好川文化遗址和鹿城藤桥曹湾山遗址示意图

和多座小山连成一体，孤立于平原的岗丘型小山。山体海拔61米，面积36公顷。

曹湾山遗址于1985被发现，2002年11月28日，由省、市考古所联合组成的曹湾山考古队，对曹湾山地形地貌进行调查和勘探，基本摸清了曹湾山的基本情况。同年12月9日，正式开始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到2003年4



曹湾山遗址出土的陶器

月28日止，发掘面积635平米，在平缓的山坪先民居住区发现距今4000多年的完整部族聚居区和墓葬群。

曹湾山遗址堆积层丰厚，内涵丰富，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山坪西南是居住生活区，山坪东南是墓葬区。在西南居住区200多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排列有致且分布密集的史前连片石构建筑基址。曹湾山遗址建筑基址，利用石础挖坑营建，底部有础基石，周边有夹石，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石础建筑规模大，营建讲究，显示出曹湾山聚落建筑错落有致的布局特点。

东南边为墓葬区，清理出史前墓葬35座，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瓷器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以及大量的陶片标本。墓葬布局层位关系清楚，均为长方形，最深1.2米，最浅0.5米，为东西向。

2005年3月16日公布，曹湾山为新

石器时代遗址。经文物考古研究人员进一步挖掘研究，揭开了温州4500年前至商代之间人类的生活状态。曹湾山遗址，不仅有完整的部族聚居区和墓葬群，而且被证明是属于“好川文化”的一部分，这就将其范围从遂昌仙霞岭北麓松阴溪一带扩大到了整个瓯江流域。

（二）屿儿山遗址的发掘

屿儿山遗址位于鹿城区藤桥镇上寺西村祖师湾自然村北部一座小孤丘上。南与阴山、龙山相望，北依戍浦江，海拔仅20米，分布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掘了700平方米。2018年5月，由当地村民在开垦承包的土地时发现了墓葬装饰木，且采集到了陶片，后上报文物部门进行文物发掘工作。

挖掘区偏山体中西部，分墓地和聚落遗址，共清理出土墓坑16座，随葬器物29件，以豆、钵、圈足盘等陶器为主，并有少量玉器、石器。在聚落遗址中清理出灰坑、柱坑等聚落类遗迹76个，大致构成4组长方形建筑。在山体制高点处有石柱遗迹，面积约40平方米的中心建筑。在遗址中南部区域有“木骨泥墙”类红烧土废弃堆积，面积约10平方米。

聚落遗址中，出土了釜、鼎、罐、钵、豆、圈足盘、壶和纺织轮等

石器270多件，以镞、铤、钺最为常见，有锥形器、镞和纺轮等玉器4件。此外，还有可鉴定的植物遗存90粒，其中有水稻12粒、小穗轴45粒。

屿儿山遗址是继曹湾山遗址之后温州市第二处发掘的重要史前遗址。屿儿山遗址柱坑底部有垫石、周边有夹石的现象，与曹湾山遗址颇为一致。

在屿儿山西北坡区域，发现3座汉六朝的长方形单室券顶砖室墓，出土环首刀、壘等各类随葬品30件。其中多件为瓯窑瓷器，有瓯窑盘口壶、青瓷碗等，瓷器装饰风格以莲瓣纹、水波纹、褐色点彩为主，还有玉簪、玉握等。此外，还有一座为凸字型券顶砖室的东汉墓。

屿儿山遗址不是孤立的遗址，它也是“好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屿儿山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2019年度浙江省考古重要发现”。

二、曹湾山“好川文化”遗址的形成与现状

（一）藤桥平原的形成与“好川文化”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

远古时代，温州沿海平原多为浅海湾，其后随着海平面的下降和沿海泥沙的淤积，到了距今约4亿年前，温州沿海平原最终成为陆地。如瓯江、



曹湾山遗址出土的锥形玉石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湾山遗址”碑和“遗址说明”碑

飞云江、鳌江等沿海平原由河流挟带大量的泥沙进入海里，经过海潮常年累月不断地携带泥沙堆积，使沿海的海滩逐渐淤积形成并不断向海里扩展延伸成为河口冲积平原。

约5000年前，温州这三条河流的河口都属于溺谷形海湾，与今日的杭州湾类似，水流一直到达今天的青田县城、平阳县城和水头镇一带。从藤桥枫桥岙村的舵屿山、上寺西村的

屿儿山、泽雅戈恬村的屿龟山等地名可以看出，在远古时期，藤桥还是瓯江流域温州湾中的海洋港湾，曹湾山是其中的一个孤岛。戍浦江上游的龙溪（泽雅溪）、西岸溪、梅溪（周岙溪）、葵溪（岙底溪）受台风、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夹带大量泥沙，为海湾潮滩发育的主要泥沙来源，因受河流泥沙与大海潮淤泥物质充填，戍浦港湾渐渐发育成淤积平原。藤桥三面环山，形成半隐蔽的低能量沉积环盒，对平原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海潮带来的淤泥也为藤桥平原的加速发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东瓯先民选址曹湾山的原因

《温州水利志》载：江河水与海水挟带的两类泥沙相遇后，会产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形成丰富的淤泥细粒，高平湖时每立方米潮水的含沙量为1.1公斤，低平潮时高达3.4公斤。在平潮静止时，便下沉形成水底淤泥层，学界称之为“海相沉积物”，俗称“青紫泥”或“烂涂泥”。潮涨潮落，遂使温州沿海青紫泥层层沉淀，顺着坡度逐渐露出海面，接受阳光曝晒，空气氧化，渐渐成为日益增高的“硬壳层”。

经过多年自然的植物生长或人工改造种植，经过改良后的土壤，逐

渐适应水稻种植。随着沿海淤泥不断堆积，陆地向大海延伸，于是沿海地区就出现了平原。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在《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一文中说：约在三四千年前，温州许多浅海区逐渐成陆。早在4500年前，温州先民就选择在藤桥曹湾山繁衍生息，过着以采集狩猎和捕鱼为主的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了“好川文化”聚落的区域。可见，藤桥平原的形成比温州沿海浅海区平原早1000多年。

藤桥平原东临瓯江，南西北三面环山。曹湾山是藤桥平原上成片的一个孤山，东南西三面被戍浦江环绕，北面平原既阻隔了山区的猛兽，又让居住在曹湾山上的东瓯先民得以免遭洪水和海潮的灾害，获得比较安全舒适的生活。乘舟从戍浦江外垵入瓯江，借瓯江潮水而上可直达青田县城，登陆可抵达内陆各地。下游可达瓯江口及沿海各地，先民在进行捕鱼生产、海上交往、狩猎、农耕等活动时都极为便利。

（三）曹湾山、屿儿山遗址与“好川文化”的渊源及研究价值

2002年11月至次年4月，省、市文物部门对曹湾山进行发掘工作，发现曹湾山又是一处好川文化的遗址。

与遂昌的好川墓地相比，尽管曹湾山墓地在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方面有一定的区别，但两者在文化面貌、内涵特征上基本相同，出土的文物如陶鼎、陶罐等的形制、纹饰也基本一致。从两处墓坑的规模、随葬品数量和组合情况方面去区分，遂昌好川墓地的等级要远高于曹湾山。如果好川墓地代表的是贵族墓地，那曹湾山墓地就是平民墓地。

专家们认定，从曹湾山山脚发现的文物距今约5000年，这不仅比曹湾山山岗上文物要早，也比遂昌好川墓地的文物要早。这支南下族群最晚也应该是在4500年前迁居到这里，由此可见，南下的这支曹湾山祖先就不一定是良渚晚期，而是良渚的早期了，也就可能不会是遂昌好川村的一支往瓯江下游迁徙到曹湾山和屿儿山，纠正了以前有专家认为曹湾山聚落群的先民有可能是从遂昌沿瓯江顺流而下来到曹湾山的结论。

张立新著《瓯人与东瓯国》评述，考古学家的认定是很有分寸的：好川文化与良渚文化在文化因素上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但不是直接的传承与发展。……好川文化在新的环境中融入当地土著的血液，并脱胎而成为另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

就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使好川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化类型。

温州市发掘的两处重要史前遗址都集中在藤桥，可见藤桥是温州祖先最早选择生产生活的地方。藤桥被称之为温州沿海文化的开端，“东瓯故地，先瓯原乡”名副其实。

2005年，将新石器时代的曹湾山遗址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是温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有明确文化堆积的遗址。曹湾山遗址和屿儿山遗址反映了瓯江下游流域东瓯先民的生活与生产，它们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为深入研究浙南新石器时代聚落布局的特点、社会结构、农业、建筑、制陶、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国内考古专家认为曹湾山遗址是浙江又一个史前文化，将其称为另一个“河姆渡”，可见它的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将产生积极影响。曹湾山遗址发掘，为研究温州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文物标本，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不仅是温州地区先秦遗址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为浙南温州地区先秦文化发展序列和考古编年的建立提供了地层学依据，也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东瓯祖先生活与生产发展的变化

对曹湾山遗址中采集的样品进行植硅石分析，发现水稻颖壳的双峰形植硅石，经判别式计算后，被证明是栽培稻。这表明生活在曹湾山的先民们已经有了较为原始的农业生产。先民们在曹湾山山脚的滩涂上种植水稻，并将收获的稻谷挑到山上的居住区储贮与食用。

在发掘出来的物品中，发现了几块夹炭黑陶片，专家以此判断，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其他一些发掘出来的箭镞，石锄等，带有明显的打制痕迹。玉片工艺精湛，开材切线工艺水平极高，集中体现了曹湾山先民高超的玉器制作技艺水平，充分显示出在4500年前瓯江流域先民过着以采集、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生活方式的文化特征，与此前发现的好川文化的各种特征相吻合。

从屿儿山出土的水稻和小穗轴等植物遗存可以推定，水稻是好川文化时期，温州先民们补充以淀粉质为营养成分的主要食物，并以捕捞、采集和狩猎获得鱼类和动植物作为补充。由此可见，早在4500年前，藤桥戍浦平原就已经形成，为种植水稻提供了

耕地。

三、曹湾山“好川文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研究方向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好川文化的发掘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个案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藤桥曹湾山墓地和屿儿山墓地的发掘，丰富和加深了文物研究人员对好川文化历史地位的认识，是好川文化发掘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

目前，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史前文化。由于曹湾山和屿儿山出土的文物不多，能提供研究温州史前先民生产、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物不全，可借鉴参考温州史前文化研究成果的资料比较缺乏，好川文化研究还停留在宣传介绍“两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过程，以及遗址出土相关文物的简介，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客观、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

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东瓯先民的迁徙与繁衍、生活习俗与生产关系，东瓯先民文化与遂昌“好川文化”的渊源关系、发展与演变，瓯江下游好川文化的历史地位及文化特征，好川

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区别及关系，“藤桥好川文化”对先瓯历史文化的意义、作用与影响，如何创建“先瓯文化品牌”促进温州社会经济的创新发展等课题。

四、创新东瓯先民文化精品文旅中心，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一）以曹湾山遗址公园博物馆为载体，打造展陈研学教育基地

曹湾山、屿儿山是新石器时代的东瓯先民遗址，承载着瓯地先民文化，蕴藏着藤桥镇“先瓯原乡·戍浦新韵”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文化灵魂。将曹湾山遗址纳入保护总体规划，让整个示范带呈现出的独特文化内涵能有继承、有依托。

入选首批省级遗址公园的曹湾山遗址文化公园已初步建成，融好川文化遗址于景观建设之中，在满足大众文化娱乐活动需求的同时，展示曹湾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曹湾山遗址公园是鹿城经济开发区的四大主题公园之一，公园秉承“承古传今”理念，通过对好川文化遗址、村庄、农耕地及周边现代工业园区的解读，将新石器晚期岗丘型聚落文化、近现代农耕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三个历史片段融合在一起，体现人类生存文明承

古传今的理念。

在建设曹湾山遗址陈列馆、博物馆的基础上，建议再扩大发掘遗址范围，并在遗址上修建既封闭又透明的曹湾山遗址陈列馆，全方位展示东瓯先民遗址场景。通过遗址陈列、文物展示、科技数字化等手段宣传温州史前文化，将“两馆”建设成为集展陈、教育、研学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瓯文化科普教育基地，让市民能够近距离观赏到4500年前先祖的居住生活场景，充分发挥文化遗址的历史特征，注入公共文化空间的教育功能。

（二）创“曹湾山文化”品牌，建科创乐业的温州都市后花园

遂昌的好川文化虽然以“文化”为注脚，但目前发掘的还只是墓地，尚未发现聚落遗址的存在。根据考古界不成文的规定，一支被单独称作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一般要有三个以上的遗址。可见当年的专家预见瓯江流域必有其他类似的遗址，故超前命名遂昌好川墓地为“好川文化”。

建议有关部门报批“曹湾山文化”，理由是：遂昌“好川文化”仅有墓地，严格来说离“好川文化”的标准要求尚未达到。而在发掘新石器时代的曹湾山遗址后，又有了屿儿山



鹿城经济开发区戍浦江南部分板块

遗址，加上附近的山福镇下龙山遗址、双屿街道的卧旗山遗址、杨府山遗址，龙湾半山新石器文化，为曹湾山文化的孕育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阐述了东瓯先民海洋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历史结合，为深化探索温州整体史前的“曹湾山文化”方向，提供了更具学术研究价值。

曹湾山遗址是继“河姆渡”“马家浜”“良渚”“好川”文化以后，分布在瓯江流域的一支史前文化遗址。曹湾山遗址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领域。打造“曹湾山文化”，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历史文化地位。通过大力宣传、扩大影响、创新文化品牌等手段，以“曹湾山文化”品牌为核心，引进高

新人才，将藤桥打造成科技创新，社会经济文化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文化高地和温州大都市的后花园。

（三）依托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农学科研文旅中心

2020年，温州首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落户藤桥，为加快农业现代化起到示范作用。2021年，藤桥被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列为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藤桥的农业从传统农业向农业科创转型。2022年，藤桥镇重点推进在温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谋划建设温州农业科技城。温州农业科技城规划范围为藤桥镇全域，总面积96.96平方公里，由核心区和拓展区两部分组成。

按照“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以及

“立足温州、引领浙西南、带动全省、服务全国”的发展目标，将温州农业科技城定位为：东瓯绿谷、共富之城，温州西部生态新城、绿色生态城市，通过3至5年努力，培育建设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依托在藤桥的温州农业科技城、温州科技职业学院藤桥校区、都市农业研究院及温州市园艺植物育种重点实验室的平台，强化校地、校企合作，打造中国南方种业博览会永久会址。将农文旅基因深植藤桥大地，建设成为传承历史文脉的农业教学、科研生产、创新创业、文化旅游中心。

（四）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藤桥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区镇，早在1929年2月就成立了中共永嘉县委下属的钟山（藤桥）区委，1929年10月至1931年期间，党组织派李振声、张学东、陈文杰等到白脚坳、田塘头、石垟等地组织开辟红军游击区，岙底山区有80%的农民参加红军赤卫队。1930年至1931年，白脚坳和田塘头村被国民党列为重点“围剿”的地区之一，村民房屋多数被烧毁。

解放战争时期的石垟、白脚坳、田塘头等村为中共永嘉县委经常活动地区之一。藤桥红色资源丰富，红色

文化底蕴深厚，有石垟村中共永嘉县委旧址、藤桥战斗遗址、田塘头村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办公旧址、红十三军连队驻址、田塘头永嘉县委旧址、田塘头战斗遗址和革命先辈的遗物等，其中，田塘头革命陈列馆、田塘头革命纪念园为温州市党史教育基地、温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促进革命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红色旅游、先瓯文化科普等深度融合，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五）以省AAA级景区镇、省园林城镇为载体，打造文旅小镇

藤桥镇先后创成浙江省园林城镇、AAA级景区镇、温州市美丽乡村标杆乡镇，农科教文旅融合特色显著。建议在“城市客厅”史馆基础上提升建设藤桥历史馆、藤桥乡贤馆、励志馆等人文资源。建设曹湾山博物馆（含陈列馆）、考古研学馆、农耕博物馆，打造慧农园、星工园、研学园、创新园，形成“一核两带三馆四园”的东瓯故地文旅产业带。

曹湾山、屿儿山是新石器时代的瓯地先民遗址，蕴藏着藤桥镇“先瓯故地”乡村振兴的文化灵魂。投资超4亿元建成“先瓯原乡·戍浦新韵”乡村振兴示范带之后，藤桥镇的乡村振

兴步入新阶段。2022年，启动了“古埠人家·藤南雅韵”示范带建设，总投资超3亿元的浙里·耘谷田园综合体和投资超亿元的云水·长歌乡村文旅综合体一期开建。坚持产城人文融合主路径，以项目为支撑，以文化为灵魂，打造装备智造、文旅融创、农业科创、全域美丽“4个高地”。

藤桥镇以乡村振兴示范带串点成线，呈现出乡村振兴新图景。实现历史文脉在这里传承，田园牧歌在这里演绎，红色与绿色游并举的农科教文旅小镇在这里展示，都市后花园的繁华在这里延续。

（作者：李岳松系鹿城区史志研究室退休干部、李培怡系温州外国语小学教师）

参考文献：

- 1.《温州沿海平原的成陆过程和主要海塘、塘河的形成》，吴松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
- 2.《温州沿海平原的变迁与水利建设》，康武刚，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
- 3.《藤桥平原的形成与上戍港的变迁》，李岳松，戎蒲文存，沈阳出版发行集团沈阳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
- 4.《瓯江山水诗路/曹湾山遗址公园：先瓯原乡，承古传今》，温州市发改委，2022年9月4日。
- 5.《泽临风云——藤桥片区游击根据地革命斗争》，李岳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苏璠与大雅山房

◇ 苏志挺

如果说要找几处最能代表平阳文化的历史古迹，人们马上会想到两个地方，一是南雁荡山的会文书院，另一处就是昆阳镇西门雅山村的大雅山房了。大雅山房是一座清代的老宅子，现在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可历史上慕名而来游玩并留下诗文的有郑朴翁、陈则翁、张綦毋、华文漪、潘鼎、端木国瑚、王翼汝、林芳、林滋秀、郑雪舫、华栋、刘绍宽、王理孚、苏渊雷等等。此外，赵之深、苏椿、屠本仁、曾衍东等亦有关于此老宅的文章诗歌存世。南宋至今700多年，这里曾经住过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林景熙、明代广东按察使吕洪和清代雅士苏璠。

关于苏璠

苏璠（1772—1834），字仲琦，号石缘，少名文登，平阳县城西雅山人。他因仰慕乡贤亮节高风，在城西雅山马鞍山麓构建大雅山房。苏璠祖

上世居观美溪边，曾祖父苏蕢。一日，苏蕢妻蔡氏清晨出外洗菜，为虎衔去，只剩一股，另葬观美茂竹温家后门坑山。祖父苏廷锡，字公佩，号世玳，清康熙间秀才。世传有哭母诗十余首，今已无传。苏廷锡伤其母之死于虎，决意迁居雅山，晚年与子日新、日章、允厚、允博等一同迁居雅山，苏廷锡为雅山苏氏第一世祖，苏璠为其孙。

苏璠是温州地区著名的篆刻家，瑞安孙锵鸣先生在《铁畊小筑印集》序言中写道：“平阳嘉、道间，苏石缘山人博雅好古，词翰以外，以篆刻名一时，近五六十年无继之者矣。”可知，苏璠先生在嘉庆、道光年间，其篆刻就远近闻名。苏璠有《大雅山房印集》四册存世。嘉庆十七年秋，端木国瑚和潘鼎来大雅山房，苏璠拿出自己所作的隶古篆刻几百颗与他们商榷，大家边讨论边挑选了三四天，最后把所选汇集成《大雅山房印

集》。对于苏璠的《大雅山房印集》，同时代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之一赵之琛（1781-1852）这样评价道：“荟萃诸家，出以己意，一种高古之气，直得秦汉真传，篆法刀法，各臻妙境，知非文、何以下所能仿佛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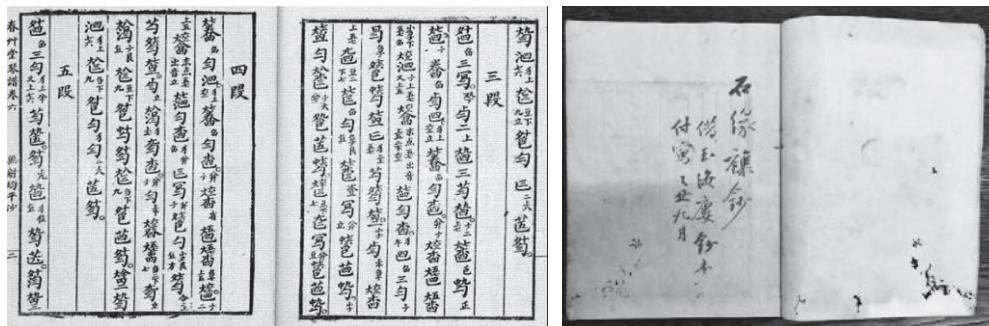
大雅山房

时赋诗赞道：“格自精严气自道，渊源真可接羸刘。一时混沌全开凿，顽石如何不点头。”

能得到“西泠大咖”的高度赞赏，说明苏璠先生的篆刻已到达一个很高的水准。苏璠是一个石痴，一生治印无数，然而现在我们却很少看到他的印章，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用来刻印的石料太精美了。鲍铭在《先师刘玉溪先生传》中有载：“余每过师所见案头刻石，磊磊甚丑，怪讶其不择佳石，师笑谓：吾以存吾刻也，往者石缘苏氏，刻必选佳石，后日宝其石而磨其所刻，则石在而刻亡矣。吾此石丑，人不磨吾刻也。”因为苏璠用来刻印的材料太好了，人们得到他的印章后，往往会把石头当作宝贝，认为印文是瑕疵而磨

去，殊不知印文尤为珍贵，这买椟还珠的行为真是让人感慨。

苏璠收藏的物品主要有古印、古画、法帖和古籍善本，以古籍善本最多，端木国瑚在《大雅山房印集》序言中写道：“横阳苏氏石缘居雅山之足，构池馆，聚图书，……观主人藏书处，壁榻俱满。”大雅山房里有一个专门藏书的地方，叫“如舫轩斋”，永嘉诗人项维仁称其“如舫轩斋万卷藏”。泰顺潘鼎曾在《与赵晋斋文》一信中这样记述：“有苏石缘者，瓯之平阳人，风雅士也。性嗜古，多蓄异书，物聚于所好，以是瓯之故家遗籍半归之。”可知当年大雅山房藏书之盛。除了书籍，苏璠还收藏许多古印、古画和法帖，一方面这些收藏可以用来学习临摹，提高书法



和篆刻水平，另一方面是供好友来此赏玩助兴。

此外，苏璠的琴艺十分的高超，华文漪在《大雅山房游记》中写道：“午后小酌罢，清谈良久，见案上古琴，因请石缘弹之。作《落雁》《海鸥》二曲，正声激澹，涤人尘襟。此时此境，飘飘欲仙，不知去人世几由旬矣。”《落雁》应该是《平沙落雁》，《海鸥》即《海鸥忘机》，就是现在流行的《鸥鹭忘机》，这二曲都是经典的浙派古琴名曲。

嘉庆十四年（1809），苏石缘与易学家、书法家、诗人端木国瑚相识，端木国瑚是清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年底被钦点内阁中书加六品顶戴，去京城为官。次年四月，苏璠到北京与端木国瑚见面，于是两人自燕而鲁，而吴，过阙里，上峯山，观李斯石刻处；游蜀冈，登焦

山，摹古鼎，仿《瘞鹤铭》而还，至武林而息焉。后端木国瑚感慨道，以京师之地，四五千里而至，八九日而返，不名不利，忽来忽去，可谓奇矣。可以看出，苏璠性情豪爽，坦诚随性，交友不为名为利。

苏璠建大雅山房，广邀地方名师来此教授乡里，如华栋、夏君等都被大雅山房奉为西席，在此教授学生。除为家乡培养人才外，他还积极收藏家乡文集，延续文脉。苏璠感幸生霁山旧里，大雅山房又是吕公住所和赵奥别业遗址，准备重镌《霁山集》。那时明天顺间乡先生吕洪所刻《霁山集》已岁久散失，于是他四处搜辑汇成编后，又苦无善本可覆校，迟迟未能刊印。1810年秋到杭州，他听说歙西鲍渌饮先生汇刻《霁山集》于《知不足斋丛书》，于是便急买舟前去拜访，在交谈中得知，五十年前

(1760), 鲍淶饮先生曾与张綦毋先生有重刻《霁山集》之约, 今书适成, 就有霁山乡人于千里之外来访, 足见文字因缘, 于是建议苏璠题跋为记其事。苏璠觉自己虽未能亲手重镌《霁山集》, 但见乡贤霁山先生的忠义之气得以流传, 多年的夙愿也算达成, 于是提笔, 谨述一时欣歎之怀。另外, 现在北门河心亭《重修金印渡文武阁碑志》上还刻有他参与建设和捐资助学的名字。

关于大雅山房

端木国瑚在《大雅山苏氏石园同主人璠》诗中写道: “架石雅山麓, 居然结构深。篆精开藓壁, 画手叠云林。”并注解道: “园中叠石, 仿狮子林, 出永嘉项维仁手。”从端木国瑚的注解中,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个信息, 一是大雅山房是清清永嘉(今温州市鹿城区)著名画家项维仁设计和建造的, 二是大雅山房是模仿苏州狮子林建造的。

狮子林是天如禅僧维则在元至正二年(1342)修建的一座佛寺, 用以纪念他的老师中峰禅师。因园中的奇峰怪石状似狮子, 中峰禅师又曾在浙江天目山的狮子岩传经, 该园得名

“狮子林”。后经明、清、民国各个时期的增建, 逐渐形成了寺、园、宅一体的寺庙园林。

苏璠先生建设大雅山房, 基本模仿苏州狮子林的平面结构布局, 分书院、苏宅和花园三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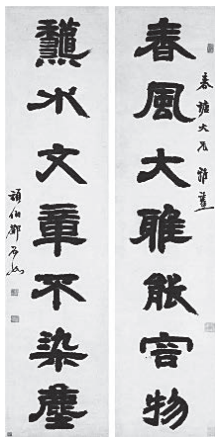
(一) 书院。笔者找到了一张1939年的户原图, 虽然距离苏璠建设大雅山房有100多年的历史, 但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大雅山房大致的轮廓。书院为日字型布局, 成轴对称, 入大门口有一条青石板路直通最后面的一排主屋。主屋前面有东西厢房四排房子, 分内院东西厢房和外院东西厢房, 内外院之间有一个门台, 门台上刻着“大雅山房”四个绿色的大字, 门台两边石柱上写着“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据说, 这楹联出自清代著名篆刻家邓石如的手笔, 现在门台已废, 仅剩半截石柱。

(二) 苏宅。书院向西约50米, 为大雅山房主人的住所, 是苏璠起居、会客和藏书的地方, 这里也是林霁山先生赵奥别业的旧址, 吕洪先生在此建吕宅, 并在南边建怡老亭, 晋斋先生去世后, 这里曾经是吕氏宗祠, 苏璠先生在此建宅, 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林霁山、吕洪先生高洁品格的思慕。

(三) 花园。苏宅的西边是一个

大花园，从户原图看，除书院相对独立外，苏璠先生的住宅、书房、会客厅、小环碧斋、如舫轩斋等都是被花园包围着，成为花园中的景点。当时的花园很大，吕洪按察使的坟墓也在苏璠的花园内。

华文漪《记游大雅山房》载：“园赢十亩许，垒石为山，为洞，为磴，为回峰，为曲厂，为仄径，为坡陀，玲珑旋折，奥如环如。入其中者，发足不数武，辄迷往来向背。园之旷处，则又浚为清池，杂以嘉卉，疏与密间，故其局舒，其势变。兼之缭垣外皆崇山匝匝，岑蔚隐映，故其境真，使人疑为天施地设，非人力所能为也。”从上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花园占地十余亩，画家项维仁用石头垒出假山、幽洞、磴道、回峰、曲崖、窄路等风景，人走入其中，会被这玲珑曲折、美轮美奂的景色吸引而迷失了方向。花园空旷的地方，又疏浚出一个清澈的大水池，园中种植着许多名花嘉卉，花卉和叠石风景疏密相间，相应成趣，让人感觉这美景不是人工可以做出来的，仿佛是天造地设一般。



大雅山房联



苏璠先生使用过的柜子

苏园的精美我们可以从以下的两张照片中略见一斑。

一是苏园中的一个石构件，可能是为了与太湖石的瘦、漏、透、皱的气质相称，工匠硬是把青石雕琢出太湖石的韵味来，下面还刻有一座小亭子，做工十分的精美，一个小构建主人家都精心设计，可想而知，当时大雅山房的建设是何其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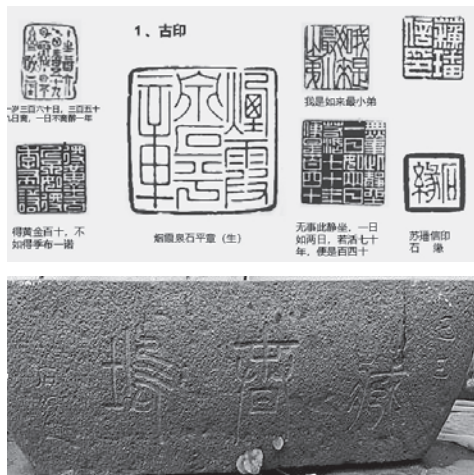
另一张照片是平阳县城西农业社制纸小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该照片摄于1957年11月25日。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假山、叠石依稀可辨，特别是人物后面的那颗高大的遒劲龙盘的苍松，透露着坚忍、顽强的力量，显示着园林主人高风亮节的精神。

端木国瑚在《大雅山苏氏石园同主人璠》诗中写道：“暑净荷浮

暈，秋浓桂落阴。人搜南雁去，先到此间寻。”一句“人搜南雁去，先到此间寻”道出了苏璠热情好客、善交友的性格。端木国瑚在诗注中说：“大雅山房曲径回峰，玲珑旋折，清池嘉卉，崇山隐映。满贮书画法帖其中，名流赏宴，远近毕集，恒数月始散。”如此优美的环境，如此好客的主人，如此丰富的书画法帖，大雅山房也理所当然成为鸿儒硕彦、雅士名流饮宴赏玩的据点，经常高朋满座，留下了许多佳话。

嘉庆壬申年（1812）秋，端木国瑚和潘鼎来大雅山房拜访。苏璠拿出自己所作隶篆刻数百颗与他们商榷，时大风雨三四日夜，秋气如海，他们三人灯每至曙，矻矻忘之。后把所选汇集为《大雅山房印集》。

嘉庆乙亥年（1815）九月十八，郑雪舫过逢原斋；次日早上，华文漪与郑雪舫一同前往大雅山房，拜访苏璠和在此教书的好朋友夏君。他们一起游玩苏璠的大花园，午后小酌罢，几人一起清谈良久，苏璠用古琴弹《落雁》《海鸥》二曲助兴，又拿出宋徽宗著色山水、吴仲圭兰竹、唐伯虎小帧画册共观。太阳偏西的时候，杭州乐师林生恰好来大雅山房，饭后大家又秉烛夜谈，高兴时林生按拍高



歌数阕，大家都十分倾慕，一直到夜漏及半，才各自散去就寝。后华文漪写下《大雅山房游记》散文，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大雅山房的重要文献。还有一次具体时间不详，但参加大雅山房聚会的王翼汝、林芳等人，留下了以“自足云霞，唯朋松石”为韵的《大雅山房赋》。

关于大雅山房的诗韵

大雅山房在南宋的时候是林霁山先生的赵奥别业，明吕洪按察使在此建吕宅怡老，死后便葬于此，苏璠先生在此建大雅山房，远近雅士名流纷纷慕来，缅怀霁山先生、吕洪按察使高洁的人品，贤主、嘉宾雅聚于此，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齐备。

自南宋至今700多年来，许多文人雅士在此处留下大量的诗词和文章，现例举一些。

赵奥别业

（南宋）林景熙

已无湖海梦，渐老足闲情。
野杖日寻壑，家书时到城。
开池纳天影，种竹引秋声。
亦爱箏瓢乐，年来世味轻。

怡老亭诗

（明）吕洪

渊明昔所须，惟酒与长年。
醉可消凡虑，寿居诸福先。
昔贤既须此，吾何独不然？
人无根蒂固，况非金石坚。
躁动伤神气，卫生贵静专。
衰荣常迭运，名寿鲜能全。
毋慕纪太常，莫冀绘凌烟。
知足斯不辱，知止庶无愆。
筮仕叨簪豸，激扬自勉旃。
行行向耳顺，岂复望高骞？
高骞不可望，遂赋《归来》篇。
仿古开三径，构亭日盘旋。
植松荫后檐，决渠绕窗前。
花木依墙院，鲇鲤戏清涟。
倚栏散游目，胸次浩无边。
子姓奉醪醑，妻室饷肥鲜。

面红耳热后，扪腹恣高眠。
觉来策藜杖，逍遥涉园田。
计耕复计获，时还理丝弦。
绰绰怡吾老，心怡寿自绵。

船屯渔唱

（清）张綦毋

欲问王孙旧墓田，栖迟东谷著书年。
樵斤不赦残山木，谁伴冬青泣杜鹃。

大雅山苏氏石园同主人璠

（清）端木国瑚

精庐生静光，苔石冷苍苍。
雨点风惊树，虫声月坠床。
蓬头吹鼎铉，撒手叠衣裳。
不共耽诗癖，谁知秋夜长？

《记游大雅山房》文后赋诗呈于苏璠

（清）华文漪

石缘供养有烟云，闭户挥毫墨藻芬。
我倩郑虔三绝手，要图邱壑与平分。
霁山赵奥著清风，今日园林与昔同。
珍重勉轩图缩本，九华真见在壶中。
偶然吊古意如何？俯仰兴怀发浩歌。
荒陇断碑犹可读，匹如铜狄细摩挲。

贺《大雅山房印集》

（清）赵之琛

妙手传神自得宜，精思端在运刀时。

谱成已觉心心印，莫以雕虫漫见嗤。

贺《大雅山房印集》

（清）屠本仁

家声千载重峨嵋，齐鲁遊踪忆昔时。
何处得来蝠扁法，焦山古鼎峰山碑。

偶读林霁山《别业》诗慨作

（清）苏椿

赵奥当年岂赵家？霁山心事寄无涯。
而今故址荒凉甚，那觅冬青一树花！

和公素先生过大雅山房之作

王理孚

名园大雅长蒿莱，盛事乾嘉兴重回。
太息羊求今不见，即留三径为谁开。

其二

衣冠画壁炳丹青，怡老前朝尚有亭。
屋自姓王墩姓谢，先生不愧草堂灵。

（作者单位：平阳县历史学会）

密室中的红色星火

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渔潭村的灵佑殿，相传初建于清乾隆年间。就在灵佑殿神龛下的密室，召开了中共温州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0年6月18日至22日，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有关政治、组织、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4项决议案，选举产生中共浙南特委，王国桢任书记。

密室入口，高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一次只能容一人低头俯身进入。整个密室约8平方米，一张长方桌、四条长木凳，几乎将空间占满，东面留有一道用于随时撤离的小门。桌上的煤油灯、红旗，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革命者奋斗过的地方，让人仿佛重回那段峥嵘岁月。

1929年，浙南发生史上罕见的灾荒，水旱并至，“温属六县饥民达四十万以上”，不少地方出现“村村饿



殍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的惨象，而征收的苛捐杂税仍有增无减，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暴动风起云涌。1930年5月，王国桢在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受中央指派，回到浙南筹建浙南特委。6月初，王国桢在慈湖南堡北湾召开筹备会，组建浙南特委筹委会，筹备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经反复勘察，最终将会址选定在渔潭村的灵佑殿内。

渔潭村是开展地下活动的理想位置。此地背靠大罗山、面临塘河，处于当时的瑞安、永嘉两县交界处，国民党的势力相对薄弱，在遇到敌情

时可在两县之间迂回。灵佑殿香火旺，外来香客多，人员进出不容易引起怀疑，加上神龛底下还有个密室，可以容纳20余人开会，既隐蔽又便于人员疏散。

中共浙南一大在渔潭村开了5天。参加会议的有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玉环、临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和永康等地的党员代表，以及工人、妇女、游击队、红十三军的代表共25人。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南特委，直属党中央领导，下辖永康、台州两个中心县委和永嘉、瑞安、平阳县委以及乐清县（区）委。

中共浙南特委的成立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的组建，标志着浙南地区

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8名特委委员在会后分头到各县指导工作，召开县区党的代表会或活动分子会议，传达贯彻中共浙南一大精神。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在浙南特委的推动下，浙南地区成立了7个县委、32个区委、404个党支部，其中农村党支部375个、城镇工人支部21个、其他支部8个，党员发展到3200名左右。到1930年8月，红十三军人数扩大到6300人左右，达到历史最高点，斗争遍及了浙南的20多个县，进行了100多场战斗，有些战斗就是由浙南特委委员直接领导。浙南特委在浙南人民中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播下了革命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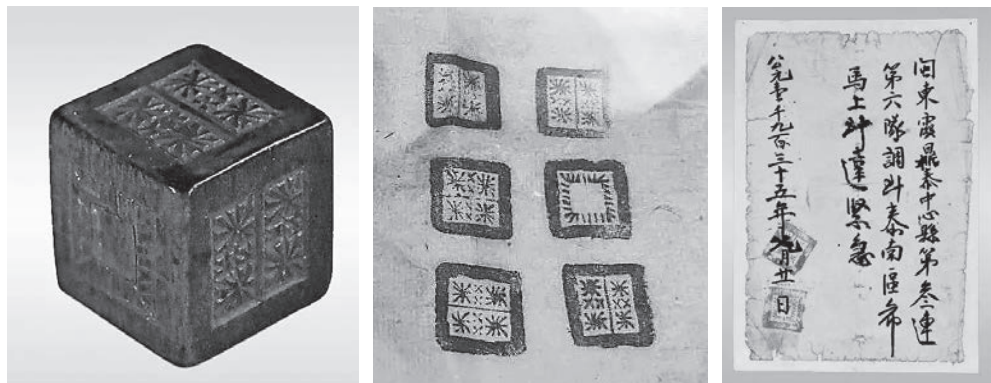
“六面密印” 隐藏的秘密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枚木制六面密印（又称六面内章）。密印的外观像个骰子，看似一枚普通印章，其实是秘密联络工具，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浙南游击区用于秘密联络的一种印信。

这枚毫不起眼的“六面密印”，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保证情

报安全的“护身符”。密印有“六面”，其实是五面刻花，花纹类似于星星，都是加密信息，代表“自己人”；最后一面虽然四周有花纹，但中间是空白，暗示“军情十万火急！”

1935年2月，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被国民党军



分割、包围、进攻的艰难时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组建，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红军挺进师组建后，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孤军深入浙江，汇合当地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斗争。

为了保持与地方武装、党组织的联系，挺进师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发展交通员，传递情报，护送人员，转运物资。1935年9月，红军挺进师政委刘英派专人呈送密印至泰南区，同时附有一封该密印使用方法的说明：

“泰南区党委、政府，二位同志：本日我交本队伍手六面内章一颗，付尔区要急应用，内有空面填名字一个，不是大急不要用空面。用别面，即有苏干队到区；有空面印到，即有大队伍来，此印不可失落。如有白匪进攻（攻），加盖空面印，切切为要。专此顺达祝尔平安公元

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十四日第七军团刘英亲付”

六面密印的使用，加强了浙南游击区的保密通信联系，为取得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9月21日，敌人进攻泰南区，泰南区便使用密印发出了紧急调令：“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调到泰南区希马上到达。紧急。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这封信函没有落款，但用了密印的两面章：一面空，一面花。“霞鼎泰”的“泰”就是指浙江的泰顺。调令上盖了两方印记，第二方印记是中空面印记，表示军情紧急。闽东霞鼎泰中心县第三连第六队接到调令后，马上赶赴泰南区，参加反“清剿”斗争。

六面密印既是一枚进行秘密联络的印信，又见证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艰苦的斗争。

吴毓的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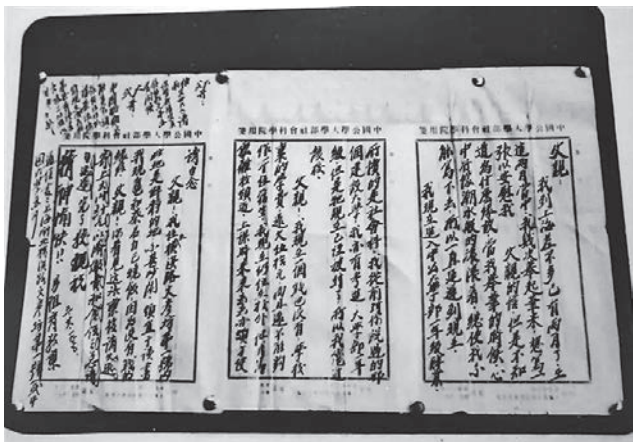
“半年漂泊自堪嗟，是处江湖亦我家。壮志未酬愁更绝，男儿谁解爱中华。”这首诗被挂在苍南县南宋镇大埔山红色教育展厅一处显眼的位置。诗的作者叫吴毓，当时17岁。谁也没想到，几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首席代表，先后两次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的代表谈判，最终取得谈判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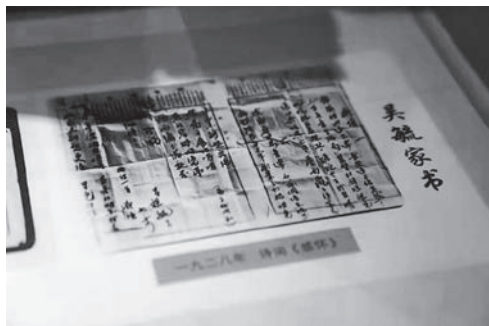
1911年，吴毓出身于秀才之家。1926年，他考入温州瓯海公学读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温州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吴毓在学校里看到遭受国民党政府逮捕、通缉的共产党员都是平时品学兼优的老师、同学，受到极大的震撼。不久，他自己也因卷入学潮被学校开除。怎样才能真正救中国？吴毓为此苦苦思索。

吴毓在写给他父亲的信中表达了这段时期的苦

闷：“今天的学子们，有几个超人出众的？有谁找到进步的爱国思想了？！科学救国，在旧制度下的中国是走不通的。”吴毓决心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后来，他与党组织有了接触，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之后，吴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吴毓在家书中写道：“父亲，为挽救将要灭亡的中国与解放大多数被压迫的人群，所以忍痛地离开你而和一切进步的人们集合着行动。我想：几年来在物质生活上你一





定是苦痛的，但精神生活上有个这样为国为人民谋独立与解放的儿子也够你光荣的了。现在，在我和祖雍哥哥会面后，敬悉你盼望你的孩子能坚持到底与严密防备，这点，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你致敬，且盼望你也抱牺牲到底的精神，时时刻刻勉励我、督促我、批评我，使我进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吴毓参与谈判的浙江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

吴毓当即写信给他的父亲，报告这一喜讯：“关于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目前已到成熟时期，不久当有圆满结果，勿念为盼。我现在更忙，不能回家，一切有你在，我也放心。生活上苦了一点，我们要忍耐，因为社会革命未成功，一切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此，以后我们要更加努力粉碎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

吴毓5岁丧母，全靠父亲抚养长

大，父子情深。但他从18岁开始，为了革命奔波在外，对父亲的思念化成一封封家书，既宽慰父亲，也加倍激励自己。在1938年3月的家书中，吴毓写道，“为了部队与救亡工作繁忙，致不能抽身返里一省久别的你，谅解儿子的心如你，定不见怪的。我部已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为叶挺），已于昨日全部出发前线，并成立驻浙办事处，暂由我负责……”

1938年3月以后的近3年时间里，吴毓担任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同时担任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我党在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执行者。1939年3月，周恩来点名吴毓担任黄绍竑（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主席）的中共联络人。

1943年国共合作形势恶化。吴毓进山收编土匪时遭暗算牺牲，年仅32岁。

建塔者——项牲传略

项牲，浙江瑞安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瑞安县青年救国服务团和政工队的骨干、中共瑞安县青年干事。救国服务团被勒令解散后，参与起草了《瑞安各界团结抗战联合宣言》，申述团结抗战的必要性。1942年参加赤石暴动，被捕牺牲。

我们都是建塔者，都以自己的青春，以至毕生的精力，建设着我们的理想之塔——共产主义。

这座理想之塔，不是我们一代人所能建成，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我们的后面，有更加浩荡的来者。

在塔的基石上，镌刻着千千万万先烈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是项牲。

项牲，1920年出生于浙江瑞安县城关（今瑞安市安阳街道）。幼年丧父，靠母亲做些针线活勉强糊口。苦

难的童年，培育了他对旧社会的不满。南堤小学毕业以后，他母亲好不容易才把他介绍到塘下白门中药店当学

徒，希望他学点谋生的本领，可以养家糊口。可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学徒生活，更加强了他的反抗性格和奋斗精神。

在中药店里，他一面按照母亲的意愿努力学习中药和中医知识，一面开始接触革命的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书籍。邹韬奋编的《生活》杂志，是他当时看得最多的书刊之一。

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浪潮，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他笑笑说：“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写新诗，控诉这个罪恶的社会。”

全面抗日战争一爆发，爱国的激



情便在项牲心中澎湃，他再也忍受不住中药店里一潭死水似的生活，毅然离去，回到县城，参加瑞安县青年救国服务团和政工队。有位小学时的老师深知他天资聪颖，鼓励他去升学。他却说：“再不奋起救国，国家灭亡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有什么用？与其做有文凭的亡国奴，还不如做没有文凭的抗日者。”

项牲走上抗日活动的征途以后，成了瑞安县青年救国服务团（后改称瑞安县战时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和政工队的一名骨干。1939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瑞安县委青年干事，在党的领导下，他在进步青年中间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又在大街开设青年书店，出售进步的革命书刊，他还经常给《平报》《浙江潮》写文章，宣传抗日、播撒革命的火种。

1939年冬至1940年春，瑞安县青年救国服务团被国民党地方政府勒令解散。项牲义愤填膺，和同志们一起，起草了《瑞安各界团结抗战联合宣言》，申述了团结抗战的必要性，严词抗议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倒行逆施。

项牲的这些活动，引起了特务对他的注意。党组织根据中央“隐蔽精

干”指示的精神，要他转移到金华一带工作。

1941年1月25日晚上，农历除夕的前夜，山城的气候更寒冷了，刺骨的朔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

项牲等人原本准备藏身在浙江潮杂志社，却被守候在房间外的特务抓走了。他们由4个特务前簇后拥，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到了离火车站不远的宪兵队队部。

第二天一早，8个全副武装的宪兵和4个便衣特务，把在金华被捕的项牲等8个人，押送到金华南方的一个小站——古方车站，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到了上饶，正好是农历除夕的午夜。项牲等人被带进了一座大的院落，那里阴森森的，像一座死神的宫殿，穿过一排又一排的房子，到了一排有木栅栏的矮屋前，宪兵才开口：“今天夜里太迟了，委屈你们先在这里过一夜。”

说罢，响起了开锁的声音，木笼的栅门打开了，项牲等人被推了进去，原来这里是宪兵第八团团部专关死囚的重禁闭室。

正月初一的下午，经过简单的审问以后，8人被一条又粗又长的麻绳捆绑在一起，由8个宪兵和特务押出宪兵团部，穿过萧条的上饶市区，渡过信

江，走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

他们先被押到一个冷僻的小村庄，后又被押出来到远处一座独立的房子。特务指指那房子说：“你们就住在那里。”

这座独立的房子是一座坚固的监狱，比前一天晚上关的宪兵团的重禁闭室牢固多了。东西两间和前面的厢房，都用大块的石头砌起来，石墙上面是粗大的木栅栏，还绕了好几道铁丝网，房子里很暗，墙脚湿漉漉的，有一阵阵令人恶心的臭味。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朝项牲他们看了一眼后，吩咐一个士兵：“快去找管理员，告诉他又来了一批犯人。”

这个军官又转过身来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项牲同伴说：“金华，是你们顾长官请我们来的。”

他笑笑说：“我们这里关的人，据说都是顾长官请来的客人，但是，对不起，一到了这里，都成了政治犯。”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茅家岭，这座房子叫葛仙庙，是第三战区情报专员室的禁闭室，专门关他们捉来的政治犯的，有一个姓尉的管理员，负责管理，我们是特务团的，只管警卫。”

在特务团士兵的铺上坐下后，借着微弱的、浑浊的桐油灯光，可以看到在那些木栅栏背后，有不少留着长发的苍白的脸。

等了一会儿，一个长着一副猴子脸、穿着灰色棉军衣的家伙，带着浑身酒气，从门外跌跌撞撞地扑了进来。这个家伙，就是尉管理员。他出来宣布：项牲等3人关在西边的小禁闭室里，林琼关在女禁闭室，其余4人关大禁闭室。

在这间小禁闭室里，靠墙边留了一条二尺阔的走道，走道尽头，放着一只尿桶，散发着刺鼻的臭气，剩下的地方，就是项牲他们的统铺，已有20多人坐着，见他们3人来了，就挤一点地方让他们坐下。

这里人太多，一个人平均只有八寸阔的铺位，再加上项牲他们3人，每人就只有七寸的地方。如果一躺平，一个人要占两个人的铺位，另一个人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了。临睡之前，先要打好竹桩。项牲他们看着那一根根的竹桩，都呆了。项牲想了一个办法：“我们三个人把当中的竹桩拔掉，侧着身睡通铺吧！”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后，项牲被尉管理员叫去了，问他：“你们两个昨天半夜里坐起来干什么？”

“实在太挤了，又有虱子咬，我们第一夜还不习惯，睡不着，坐起来捉虱子。”

回来后没一会儿，项牲就被调到大禁闭室去了。

不久，监狱里流行着一种似疟疾又似伤寒的疾病，不断有人死亡，尉管理员怕人死多了不好交代，只得在附近找了一个中医来给病员把把脉、吃吃中药，但是，不仅没有效果，生病的人反而越来越多了。他们就说是“发牢瘟”，在村子里找了一个道士来捉鬼，吹吹打打闹了一夜，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

在这场疫病中，项牲也传染上了。他身体发热，一天、两天、三天，热度老是不退，而且热度一天高于一天，直到高烧到神志昏迷，十来天不吃一点东西。

后来查出，这种高烧不退的病，既不是什么“牢瘟”，也不是恶性疟疾，而是回归热，由虱子传染，只要打针药就会治好。项牲终于战胜了死神。

1941年2月中旬，茅家岭监狱大笼和小笼的门同时被打开了。项牲等3人一起被提了出去，解到汪家湖特务情报专员室受审。

项牲先被传进去，同伴坐在中间

的堂屋里等，堂屋与审讯室只有一板之隔，他们的动静，可以听得一清二楚，例行的核对姓名之后，只听见有很高的声音在问项牲：

“你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

“没有。我是个爱国青年。”

“好，你承认是爱国青年，我们知道，爱国青年都参加共产党，你当然也参加了。”

“按照你们的逻辑，不爱国青年，都参加国民党。”

“胡说，你要老实。你们支部里还做些什么人。”

“我们青年服务团的人可多哩。”

“混蛋，我不是问你服务团人员，是问你共产党的人员。”

“不知道！”

“来人，上刑。”

接着是打人的响声、上老虎凳的响声、喷水的响声……可是没有听到项牲的呻吟，也没有听到他回答特务的任何一话语。

在集中营中，特务为了粉饰他们的法西斯暴行，要项牲他们办墙报，项牲他们则利用墙报来进行自我教育，激励大家的斗志。

项牲在第一期墙报上，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歌蔷薇》，原诗全文

如下：

这是艳丽、芬芳、恬静人生的爱。

繁华呀，妩媚啊！

没有它的人生，是荒凉的。

被她遗弃了的人呢？我也是：

只有叹息、流泪。

朦胧里我曾见到了它，的确是它。

我曾迎接它，卑躬讴歌着。

唉！这是梦！幻灭的梦！

和我同样命运的人们哟！不要哭，

它仍然屹立着。

用血，殷红的鲜血！

它会爱慕血的美。

那时它才是我们的。

在这首诗里，他用隐晦的笔调，写出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他呼号“同样命运的人”，不要“叹息、流泪”，“不要哭”，而要“讴歌”它，“用血”，用“殷红的鲜血”去爱慕它、保护它。因为蔷薇也“会爱慕血的美”。这正如在集中营里经常唱的《黎明曲》中的两句话：

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了人间，

还怕什么流血牺牲。

在以后几期的墙报上，项牲继续用笔战斗。写了《普罗米修斯偷火的故事》，歌颂普罗米修斯舍身把火、把光明带给人类的牺牲精神，鼓励大家不要怕牺牲，而要像普罗米修斯那

样，勇于自我牺牲。

在另一期墙报上，项牲仿郑板桥的“六分书”字体，抄了两首诗。一首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中的四句：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不仅字体飘逸，令人喜爱，更主要的是他借用文天祥的诗，来向大家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

另一首是：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

他的同伴问他：“‘力拔山兮气盖世’，是楚霸王项羽《垓下歌》的名句，我记得原诗的下一句应是‘时不利兮骓不逝’！”

他笑笑说：“我嫌后一句太消极了，把刘邦《大风歌》的‘大风起兮云飞扬’移了过来，更可显出楚霸王的气魄！”言谈之间，看得出来，他多么希望能掀起一场大风云，把这个囚禁他们的荒山拔掉。

在坚强的共产党员面前，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曾经声嘶力竭地叫嚣：“就算你们是钢铁，我也要熔化你们。”贯穿上饶集中营的全部斗争，也可以说是“熔化”与“反熔化”的斗争。项牲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

1941年的秋天，项牲在冯雪峰等人的领导下，在青年被捕者之中进行秘密串连。

项牲等人被逮捕已经9个多月了。他主张大家联合起来，给第三战区的特务头子张超写一个要求无条件释放的报告。

一份由宿士平起草的义正词严地要求无条件释放的报告送出去了。

张超大发雷霆，把项牲找了去审问。

“这份报告是你写的吗？”

“是我抄的。”

“谁叫你抄的？”

“大家叫的。”

“唉，你很年轻，写得一手好字，我打算重用你。希望你把教你写报告的人告诉我，就没你的事了。”

“这报告是我们一致的要求，请你履行诺言，如期恢复我们的自由。”

“年轻人，不要急，迟早总会分配你们工作的。”张超阴险地笑着。

“不，我们不要求你分派工作，只要求恢复自由。”

张超勃然大怒：“你不识抬举，给我拉出去。”

项牲被送回集中营后，遭到了一顿毒打，又被罚站一天木笼。这只

木笼有两尺见方，由四根碗口粗的木柱、八根稍微小点的木头做成，周围上下都用有刺的铁丝绕得严严实实。人站在里边，不能转身，也不能坐下来，站久了，没了力气，一靠上去，就会被刺得鲜血直流。

1942年4月，集中营内部改组的时候，项牲和另一人被编到第六中队。六队在敌人心目中，那就是“顽固队”。

是年春夏之交，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打通浙赣铁路的战役。6月5日，项牲等人在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和特务押送下，走出了筑起的层层围墙和铁丝网，离开了囚禁一年多的上饶，开始了长途跋涉。

六队展开了秘密而紧张的活动，计议着如何以最少的牺牲夺取最大的胜利。行军途中兵荒马乱，最理想的方案是200多人一起暴动，解除特务和宪兵的武装，彻底砸毁法西斯集中营，把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都解救出来。但是一路上，狡猾的特务始终没有让“顽固队”在一起休息。

6月17日下午，项牲他们离开古老的崇安城，继续向南行进，到了赤石镇。在镇的西边，有一条100多米宽的崇溪，清清的溪水缓缓地向南流去。

在溪的那边，延绵着四五里纵深的丘陵地带，再过去就是雄巍的武夷山。

六队在这里渡河的时候，举行了著名的赤石暴动，项牲参加了暴动。

不幸的是，项牲因为患了痢疾，加上腿部受伤，走得不快，未能突围。第二天特务调了一个师的兵力，在武夷山一带搜山，项牲被捉了回来。

特务起初竭力引诱他：“我们知道你是很孝顺的，在家里有个老母亲，年轻守寡，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了，你忍心丢下她不管吗？只要你把六队组织暴动的情况讲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去。”

“我想念我的母亲，爱我的母亲，她是中国的伟大女性。她爱自己的子女，更爱子女的人格。如果我为了母亲而辱没了自己的人格，那就不是爱我的母亲，而是得罪了母亲。”

项牲是个很有感情的人。在狱中他常常向同伴讲起他的母亲、他的弟

妹，他是很思念他们的。但是，在真理与邪恶之间，他选择了真理，而不得不放弃了母亲，这是忍受了多么巨大的伤痛呀！

特务引诱未成，就惨无人道地毒打项牲，把他吊在一株枯树上，用五升斗倒扣在他的头上，打得他昏死过去好几次，当他被水喷醒时，还是那句话：“要杀要剐由你们。要我讲组织暴动的情况，万万办不到。”

特务剥光了他的上衣，用香烧他的胸部，用针刺他的身体，他还是没有一句话。

6月19日，在去虎山就义的路上，项牲已遍体鳞伤，走得很慢，但仍昂首挺胸高声朗诵：

生死安足论，凛然万古存！

牺牲时，他还只有22岁。

1954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项牲为革命烈士。

（文章来源：《浙南百名英烈传》）

温州陈皮：冠绝唐宋

◇ 金益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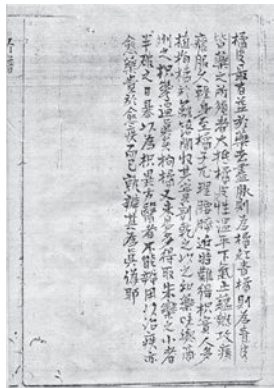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历次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20年1月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在中医治疗方面首次提出陈皮相关应用以来，在此后的多版诊疗方案中，陈皮等多种中药材都被搭配成不同的中药制剂。

近年来，陈皮市场一片火热，温州陈皮也迎来了发展契机。翻开温州陈皮的历史，是一部辉煌的篇章。唐宋时作为道地产区冠绝全国，其药用价值受到李时珍的推崇，定温州柑橘皮为处方药名！

“中国人在品尝生活的甘甜之时，似乎也很善于欣赏苦。中国人善于‘吃苦’，是因为苦味的背后，蕴含着更加丰富的味觉感受。这种味道不只在食材，还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调味品，比如陈皮。”这是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中对陈皮的描述。温

州人以吃苦耐劳、善于创新名扬天下；而温州盛产先苦后甜的独特柑橘——瓯柑，其果皮是《中药大辞典》中记载，干燥、陈化可入药的5种（瓯柑、茶枝柑、四会柑、焦柑、右柑）柑类果皮之一，有理气化积、润燥祛湿、化痰止咳、降血脂等作用。

南朝著名医学家陶弘景最先提出橘皮“陈者良”这一概念，并为后世所沿用。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橘柚条下记载：“此是说其皮功尔。以东橘为好，西江亦有而不如，其皮小冷，疗气，乃言胜橘，北人亦用之；并以陈者为良。”江西中医学院魏莹等考证：《本草经集注》所述“东橘”应是今“长三角”地区的江浙一带，并认为之所以陈皮陈用的目的，是既能理气调中，又不因燥性烈而伤阴。其功效侧重于理气调中，用于脾胃气滞诸症，达到行气而不伤津耗气的目的。而新产橘皮因其性燥更适用于湿浊中阻之脘腹胀满，恶心呕吐，



《永嘉橘录》



清《随息居饮食谱》记载瓯柑皮药用价值

不思饮食，痰湿壅肺之咳嗽痰多。

据《陶弘景温州行踪考》考证：有“山中宰相”之称的南朝著名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曾两次游历温州，并在瑞安、永嘉隐居多年，其间编著《真诰》《本草经集注》等书。由此推断，温州陈皮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传承。

宋淳熙五年（1178），南宋温州知州韩彦直撰写的世界上最早的柑橘学专著——《永嘉橘录》描述：“橘皮最有益于药，去尽脉则为橘红，青橘则为青皮，皆药之所须者。”见证温州陈皮悠久的历史传承。被誉为“天下第一药典”的《本草纲目》进一步阐述了橘皮的作用：“橘皮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和，化痰治嗽，顺气理中，调脾快膈，通五淋，疗酒病，其功当在诸药之上。”李时珍根据韩彦直《永嘉橘录》：“柑橘出苏

州、台州，西出荆州，南出闽、广、抚州，皆不如温州者为上也”之论述，定温州黄橘的皮为处方药名。经中国中医科学院王艺涵等专家考证：唐宋时，浙江温州是橘皮（陈皮）道地产区，明代晚期橘皮道地产区则集中在浙江、广东、福建三省。

清代《随息居饮食谱》记载：“永嘉所产瓯柑，其皮辛甘凉，下气、调中、解酒、杀鱼腥气；可以入茗，亦可煨肉。”温州历来为地产药材的集散地，温青皮、温桔皮是温州地产大宗中药材。清光绪三年（1877）4月1日，温州辟为通商口岸后，温州桔皮还出口到蒙古等国。如今，东北人还有用柑皮泡酒为药，以驱寒毒。现代医学证明，瓯柑皮中含有丰富的新橙皮苷、柚皮苷、枸橼苷及川陈皮素、桔皮素等物质，对高血压、糖尿病有较好疗效，并有抗疲



陈皮制作过程



陈皮泡茶

劳、耐缺氧，消炎、抗病毒、抗肿瘤等作用。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百年药房“叶同仁堂”曾推出“食橘还皮”这一新鲜事，上了年纪的温州人仍记忆深刻。“免费吃橘，吃瓢还皮，存络吐核”，要从橘品入药说起，瓢少见于做药外，其余皆为重要药材，药界习称“五橘”，即橘皮、橘红、橘白、橘络、橘核。旧时的橘皮，多数来自“糖儿担”，以敲糖（兑糖儿）换购方式得到。这种收集方法，导致了橘皮干湿不匀，形状各异，色泽杂乱，质量参差，与“道地药材”相背。叶同仁堂力图恢复温州橘皮声誉，不惜重本，率先从广东新会县（今江门市新会区）运来橘子，又从平阳泥山（今苍南宜山）精选一批成熟的优质橘子，然后张榜“免费吃橘”，还适当付酬，吃不完也可以

“兜着走”。

一年一度“吃橘”之举，是当年国药业的盛事，叶同仁堂的厅堂、通道摆满了八仙桌，药工、食客分工明确。药工以橘子脐部为中红，用刀划成“人”字形，取出橘瓢，装上木盆，供观众免费吃橘。橘皮略加晾晒后，用炭熨斗（低温）烫压平整。干燥后，分大中小片，用红丝头绳捆扎。

现如今，沉寂多年的温州陈皮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其制作技艺被列入瓯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本土企业挖掘其历史文化、药用价值，建设了非遗体验馆，并开发了瓯柑陈皮系列产品，作为温州特色伴手礼推向市场，产品荣获瓯海区十佳特色文旅商品、浙江优秀旅游商品，还入围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作者单位：瓯柑非遗体验馆）

温州民间俚语六则

一直以来，温州话被学术界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温州话中的俚语，因其包含浓厚的温州地方特色，展现温州人民劳动实践经验、为人处世道理和人生哲理感悟等，为世人称道。本期《温州史志》给读者朋友介绍6则温州民间俚语，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让丰富多彩、言辞精炼、生动诙谐的温州俚语为更多读者知晓。

一、正月初一送元宝，好、好、好！

温州民间流传着这一句俚语：“正月初一送元宝，好好好。”有的还在后面加上几个字：“你好，我好，大家好。”

正月初一送元宝，是过去的一种民俗，由一个人敲着竹板、现编讨口彩的歌谣，另一个人挑着箩筐、手摇樟树枝，跟在后面专门紧接尾句高喊一个“好”字。他们在人家门口先好话连篇地说“紫气东来、五福临门、



子孙满堂”等讨彩语后，再唱《送元宝》歌。其歌谣一般是这样讲的：

“元宝进门台，好！金银大发财，好！元宝进道坛，好！金银叠成山，好！元宝进阶檐头，好！积德积善现世修，好！元宝扭一扭，好！养猪大如牛，好！元宝显一显，好！赤脚蓬头刘海仙，好！金银钞票送上门，好！福禄寿喜万万年，好！”一唱一和，以求主人欢喜。于是大家把年糕或零钱相赠。

此俚语一般是用来批评嘲讽一些老好人的所作所为，比如有些人不愿意或不敢批评领导，叫他提意见，他就会说“正月初一送元宝，好好

好。”但是把此俚语作为一种习俗来看，它本身却反映了人们祈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二、正月正月慢，二月新挂闼

“正月正月慢，二月新挂闼”，这是“老古诗”、旧习惯。过去在春节期间有探亲、拜年闹灯会、游春等活动，要过一段较长的欢乐安闲的日子。直到二月初，学校才正式上课，机关才正式办公，工人才正式上班做工，各行各业才“挂闼”。

“闼”是指门，《说文新附》：“闼，门也”。温州话里还有：“闼门、店闼、店闼板、店闼门”。把店闼门卸下来放好，在店堂前挂上遮阳竹帘表示开始营业。于是，人们就说出来说来一句顺口溜：“正月正月慢，二月新挂闼”。

“挂闼”也作“穀旦”，谷，就是美善，旦就是日子。谷旦就是吉

日良辰。《诗·陈风·东门之枌》：“谷旦于差，南方之原。”“见朝日善明，无阴云风雨，则曰可以相择而行乐矣。”正月是一年的开头，在温州来讲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农事犁田下种还嫌早些。那就过个慢慢是恁的生活吧。待到二月份气候也转暖些，选择一个吉日良辰开始一年的劳作。

慢和快，看似对立，其实相辅相成。温州人还说“三紧三慢”，有慢有快，该出手时就出手。正月正头多休养生息蓄势待来年是应该的，但是休整应该有度，时不我待，以奋斗姿态逐梦未来，不负时代，不负华年。

三、正月嬉，肉杂鸡

“正月嬉，肉杂鸡”，这句俚语表现温州人过去过新年时正月头走家串户，嬉嬉游游，吃吃尝尝（“尝”，音“次”，看）的悠闲情景。阖家团聚，饭香四溢，是过年最



重要的仪式感。“肉杂鸡”，是温州人认为吃得好的标志，有肉有鸡，好菜挟挟，老酒喝喝，农历正月头几天过得那是神仙的日子。如果有人问：“一年中什么时间最爽，最好吃？”那对方一定会说：“正月，正月，‘正月嬉，肉杂鸡’嘛。”

“正月嬉，肉杂鸡”，据说这是瑞安童谣《年初到年尾》的第一句。整首童谣描绘了一幅风情民俗图：一月嬉，肉杂鸡。二月忙，年糕炒炒糖。三月份双上坟饼，四月大麦正好顶。五月杨梅真好吃，六月蚊虫叮苦极。七月巧食分双双，八月月饼嵌芝麻。九月登高菊花香，十月官府晒衣裳。十一月甘蔗松又甜，十二月份岁打炮仗。

四、牙儿塌开，糖金樱捣裂爻恁

牙儿，就是牙齿；塌开，就是“裂开”，形容一个人高兴时露出牙齿的样子。“塌”，音“塔”，跌落、脱落，这里作露出来的意思。糖金樱，一种形似石榴的糖果，用白糖制成。这里的“樱”，樱花的樱，有人写作“杏”，木字下面写个口，白读音为“哀”。金樱，即石榴。糖金樱（杏）有大有小，小的约几两重，大的有三四斤。送礼时，一般大的给



女方双亲大人，表示尊重；小的则视女方亲友多少而定，有多少人送多少礼。这是沿袭古代以送石榴祈求子孙满堂的习俗，含有祝愿各位亲友婚后也能像石榴那样腹中“多子”之意。

此典说的是男方有一弟兄骑三轮车送糖金樱时，竟时不时双手离开车龙头，好显示其车技高超，一路“威风”。由于分寸没扣好，骑到桥头，上坡时没了冲劲，结果反而顺势退了下来，弄得个人仰车翻。一车的糖金樱全部翻在路上，一个个张着口子，都被“捣裂爻”了。此时，骑车的人还觉得特别有趣，捧腹大笑，而他牙儿塌开的笑状与糖金樱捣裂爻的形状竟然一模一样。

后来，人们把一个人张口发笑的样子称作“牙儿塌开，糖金樱捣裂爻恁”，是一种讽喻、开玩笑的味道。说某人喜事临门，异常高兴，笑得咧开了嘴，像那贺喜的糖金樱捣裂了一样，一片片似红唇。

五、爇饭汤，喝眼光

“该日粥饮汤，眼睛喝底光；明天爇饭汤，肴配（下饭菜）沃（都）不用。”这是少儿时期经常念的两句童谣。童谣里的“爇饭汤”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爇”这个字的读音和意思。

“爇”，普通话有两个读音，一个读(yè)，作“烧”解释；一个读(zhǎ)，同“炸”。上面童谣里的“爇”读(yè)，方言音“阐”。《广韵》的解释很明白：“爇”，丑辄切，汤爇。方言里，词义更接近“煮”，如广州话的saap6，潮州话的zah8。“煮”的现代词义，是指将食物放在多量的水中，先猛火煮沸，再慢火煮熟的一种方法。《玉篇》：“爇也”。唐玄应《一切经音义》：“爇，江东谓爇(yuè)为爇。爇，煮也，余乃召僮，汤以濯之。”苏轼《十二时中偈》：“百袞油铛里，恣把心肝爇。”《西厢记》：“茶饭已安排定，淘下陈仓米数斤，爇

下七八碗软蔓菁（大头菜）。”

我们温州人常说，“爇饭吃”“温暖汤爇牛肉”“茶壶里爇粽——肚里有，倒不出”等等。

“该日粥饮汤，眼睛喝底光；明天爇饭汤，肴配（下饭菜）沃（都）不用。”每当想起这几句凄苦中略带调侃的童谣，就仿佛会重回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而今天，粥饮汤与爇饭汤这两汤已是慢慢享用的美味佳肴了。再作新童谣四句以飨各位诸君：

天光吃爇饭，日昼肉挟挟；

接力麦饼甜，黄昏酒呷呷。

“爇饭汤，喝眼光”作为俚语来用，是通过幽默的语言来表示吃的虽然清淡，可也有益于健康。例如，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吃的是泡饭，可“爇饭汤，喝眼光”，比起大鱼大肉来，还好几倍呢！

六、只要运气好，不用天光早

“运好”即指“运气好”。温州人习惯将某件事情达到满意结果或遇到意料之外的收获时，往往用“运好”二字归结客观因素的存在，却淡化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似乎一切成败都取决于时空的巧合。

这句俚语意谓有些目的并不全

是通过顽强意志和不懈努力才可达到的，而是包含着不少巧合的分子。以前有两名钓鱼爱好者，甲某素以耐心、细心见长，要实现钓大鱼的目的必须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于是他天一亮（温州人俗称“天光早”）就“全副武装”地在河边静候，一直到夜幕降临才收工，但只收获了几条“白闪鬼”。而乙某就没有这样的耐心，“天光早”不起来，到晚上又坐不住，索性随意选择中午太阳顶头晒

时出来玩一下子。殊不知，就是他玩一下子，那条“愿者上钩”的大鲤鱼竟张嘴上钩了。人们见状皆称乙是“只要运气好，不用天光早”。

此俚语在温州很流行，虽带有浓厚的唯心论色彩，但其中也有强调抓住机遇的意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运好也要天光早。

（部分资料来源：《温州民间俚语诠释》）

第四批温州市党史教育基地名单公布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指示精神，根据全省第十次党史工作会议的要求，助推我市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走深走实，提升我市党史教育基地建设、管理和使用水平，经各地推荐、实地考评和领导小组评审，12月16日，第四批温州市党史教育基地名单公布。

龙湾革命教育馆（龙湾区）

虹桥起义纪念碑亭（乐清市）

南岙革命烈士纪念馆（瑞安市）

郑海啸故居（平阳县）

林秉权革命教育展示厅（泰顺县）

浙南红色体验实践基地（泰顺县）

南坪革命烈士纪念馆（苍南县）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五岱山纪念馆（苍南县）

首届“最美温州人·最美史志人” 名单公布

根据《关于开展首届“最美温州人·最美史志人”评选宣传活动的通知》（温史志〔2022〕11号）要求，按照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业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评选标准，经单位推荐、征求意见、评选领导小组评选，11月2日，首届“最美温州人·最美史志人”名单公布。

- 任 武 温州革命历史纪念馆工作人员
张致光 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
郑祥斌 瓯海区党史研究室（区地方志研究室）编研一科科长
谢海燕 洞头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室）史志编研科科长
林丽娜 乐清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科科长
宋维远 瑞安市地方志研究室原助理研究员
陈晓楚 永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馆长
徐世槐 文成县社区学校原中学高级教师
陶汉心 泰顺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
钱克辉 苍南县委党史研究室（县地方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

永嘉四灵诗词中的温州元素

◇ 李亮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温州诗人以其追求平淡自然的诗意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永嘉四灵，并在名家辈出的中国古典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四灵之一的诗人翁卷和赵师秀，他们的代表作《乡村四月》和《约客》曾被编入《千家诗》，为人们所熟知。

乡村四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永嘉四灵”称号的由来

“永嘉四灵”，指南宋四位永嘉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玠（号灵渊）、翁卷（字灵舒）、赵师秀

（号灵秀），因他们同出永嘉学派叶适之门，其字或号中又都带有“灵”字，故称“永嘉四灵”。

这四位诗人，怎么字号中都刚好带有一个“灵”字，这是巧合吗？其实不然，这是他们有意为之的。据《宋诗精华录》卷四载：“翁卷，字



灵舒，永嘉人，永嘉四灵之一。四人因卷本字灵舒，遂改道晖为灵晖，文渊为灵渊，紫芝为灵秀云。”可见，四人中最初只有翁卷字号中带有“灵”字，而另外三位都是特意改了字号的。那他们为何要改字号呢？学界有三种猜测，一种认为他们是“组合出道，以便炒作”，一种则认为他们是“抱团取暖，共襄诗业”，还有一种则认为他们是为了表达对谢灵运的景仰与追随。浙江大学赵平教授在他的专著《永嘉四灵诗派研究》一书中，明确表达了“组合出道，以便炒作”的观点：“永嘉是一个具有炒作土壤的地域……叶适热捧四灵，赚足人气，后又适时推出刘克庄等人；四灵之间共游、互赠、遥念、哭灵，题材类似，情感复叠，种种行为密集穿插，首首诗句相与描摹，自买自卖，不停地跟帖，构成滚动推进的炒作链。”针对赵平教授的观点，我更倾向于戴柏葱的论断，在《抱团未必就是炒作》一文中，他提到：“永嘉(温州)地区自古偏僻，三面环山，一面是水，可谓山水阻隔，闭塞不通。但也正是这一独特的地理生存环境，赋予了温州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无论是南宋‘义利并举’的‘永嘉学派’，还是

现在‘其人善贾’走南闯北的温商，他们都是审时度势，敢为人先的代表。”将字号改成统一的“灵”，可能只是四个平凡的民间诗人之间的抱团取暖，共襄诗业，同时也可借以表达对谢灵运的敬仰之情。

“永嘉四灵”的生平

徐照(?—1211)南宋诗人，字灵晖，自号山民，永嘉人。家境清寒，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身。能画，喜游览，以诗游士大夫间，行迹遍及今湖南、江西、江苏、四川等地。据说嘉定四年(1211)闰二月，因服一僧人给他的“烈剂”而死，年约五十。在“四灵”中，他去世最早，赵师秀“集常朋友殡且葬之”。徐照从未走进官场，因而他的生活有时十分窘迫，和做过小官的徐玘、赵师秀相比，内心有更多的痛苦，这点在他的《和翁灵舒冬日书事》《送侯宁》等不少诗作中有所表达。

和翁灵舒冬日书事

秀句出寒饿，从人笑过清。
步溪波逐影，吟竹鸟磨声。
酒里安天运，春边见物情。
耕桑犹罄乐，何事可营生。

送侯宁

芳兰杂萧艾，独鹤随鸡九。
 男儿暂困厄，困厄谁怜君。
 或云深林间，其馥人自闻。
 何如鼓双翼，轩昂九霄云。

由于徐照一生都生活在民间底层，所以他的作品可能比徐玘、翁卷、赵师秀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譬如他的《促促词》就深刻揭示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促促词

促促复促促，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一年两度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小儿作军送文字，旬日一轮怨辛苦。

徐玘（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原籍泉州晋江（今属福建），父徐定，娶永嘉鲍氏，遂移家永嘉。父徐定曾任潮州太守，徐玘受父致仕恩任建安（今福建建瓯）主簿，历任永州（原湖南零陵）司理、龙溪（今福建漳州）丞，移武当令，改长泰令，未至官而卒。为官清正，有政绩，有益于民，叶适

《徐文渊墓志铭》有详细记述。嗜书法，“无一食去纸笔”。徐玘写过一些五言长律和五言古体诗，其中《传胡报二十韵》是专写国事的作品，抒发“久欲靖中边”的思想。他曾指出，应当接受轻启边衅的教训，要谨慎从事：“亡北惟堪伺，良图盍自坚？藩篱兼谨守，阃外勿轻捐。”同时又说：“晋赵非殊异，山河本浑全。人心方激切，天道有浑全。王佐存诸葛，中兴仰孝宣。何当渭桥下，拱揖看骅骝！”表现了对收复失地、山河一统的热烈向往。

翁卷，字灵舒，温州乐清人，南宋诗人，生卒年不详。尝登淳熙（1183）乡荐，后曾在越（两浙东路）帅和江淮边帅幕中供职。终生未仕，飘泊江湖，在四灵中他是最晚去世的。翁卷大半生飘泊于江湖，他的内心是苦闷的，他在《送刘几道》中写道：“我愚百无成，蹭蹬空林居。”在《行药作》中：“有口不须谈世事，无机惟合卧山林。”他对国事也未能忘怀，到了京口，看见铁瓮城和戍边楼，于是哀伤失地未复，国家分裂，不免触发起“无限愁”，反对朝廷的妥协政策，表现了爱国的感情。他的《东阳路旁蚕妇》则述说了民间百姓的疾苦。

东阳路傍蚕妇

两鬓樵风一面尘，采桑桑上露沾身。
相逢却道空辛苦，抽得丝来还别人。

赵师秀（1170—1219），字灵秀，号天乐，宋太祖八世孙，南渡后定居永嘉。光宗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任上元（今江苏江宁）主簿、金陵（今南京）幕从事，筠州（今江西高安）推官。晚年寓居杭州西湖之滨。赵师秀原是汴京（开封）人，南渡时徙居永嘉，因此诗中往往流露出怀念故国之情：“北望徒太息，归欤寻故园。”他对统治集团偏安江左、抱残守缺、不图恢复的国策是深为不满的。赵师秀身为皇族中人，既然做官，也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官舍初成》中说：

“官是三年满，
身无一事忙。不
知何补报，安坐
恐难当。”对现实
也有过指责，不
过，更多的时候
则是失意，最后
只好回到他的诗
国里去，甚至和
僧道为伍，向

往起他们寂静的生活来。赵师秀晚年寓居西湖之滨——孤山之上，据说死后也安葬在孤山。

“永嘉四灵”诗歌的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至唐，已达到了颠峰状态。唐诗的丰神情韵，令后来者望而却步。紧随于唐的宋代诗人，惟有另辟蹊径，自成面目，才可望与唐诗一争高下。于是他们避开了唐人所擅长的“兴象气骨”发挥自身的优点，把学问和道理融入诗中，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特色。宋诗讲究思致、道理，读来别具风味。但是盛极必衰，至南宋后期，宋诗已是弊病丛生，既有江西诗派“叫嚣怒张”，借



诗歌展览学问，又有理学诗派把诗歌当成政治教化的工具。在充斥着陈腐之气的晚宋诗坛，“永嘉四灵”似是一股清新的风，令人眼前一亮。他们虽然官小位卑，才力浅弱，却独树一帜。他们反对异化的诗学观，主张尊重诗歌的美学规范，强调诗歌的情感特质，试图将宋诗从“事”与“理”的包围中解放出来。

此外，“永嘉四灵”还是一个明显带有温州地方特色的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地域命名的诗派很多。由于诗人们生活于同一地区，受同一地域的自然、人文因素的影响，彼此之间很容易形成一致或相近的风格。温州古为瓯地，位于浙闽相接之地。据《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继编弘治温州府志》载：“温之为州，最浙东极处、负上滨海，郡当瓯粤之穷，地负海山之险，环地十里，负海一隅。始议建城郭时，郭璞登山相地，有数山错立如北斗，因曰：‘若城于山外，当骤致富盛，然不免干戈、水火之虞；若城选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守。’于是城于山，且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控山带海，利兼水陆，实东南沃壤，一巨都会。”从中可以看出，温州偏于东南一隅，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人民生活

安逸。

温州有山有水，景致迷人，史载“山川宏丽、林木深阻”，境内风景名胜数不胜数，它不仅赋与“四灵”以灵秀巧慧之资，也吸引着他们的目光，激发他们对自然之美的追寻，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四灵”的诗歌中描写过的永嘉风光的就有大龙湫、富览亭、灵岩、吹台山、雁荡山、江心寺、谢公岭等，此部分作品是其诗作的精华，多为后人叹赏，如翁卷的名作《野望》。

野望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

永嘉山水对于“四灵”隐逸之趣和恬淡之性的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山水秀美，可以怡神悦目、消烦除忧；密林深山，远离人境，又多奇人高士，使人忘却世界，心无杂尘，这一切，对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四灵”来说，仿佛是上帝在关闭了一扇大门之后又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山水对于“四灵”无私的接纳，使他们在丑的现实世界之外找到了一个美的天地，于是他们抛弃人世转而投向



了自然的怀抱。

永嘉也是一块名人荟萃之地，大诗人郭璞、谢灵运，书圣王羲之，文学家孙绰、颜延之、丘迟，史学家裴松之等曾先后出任永嘉郡守。晋永和三年（347），王羲之游永嘉，今之墨池坊、五马街、富览亭等相传都与他有关。晋太和二年（367），葛洪在乌牛下村天然道观修炼，至今还留有他的炼丹台。南朝时的“山中宰相”陶弘景曾隐居在温州陶山，编著《真浩》和《本草经集注》。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探访好友张子容，从襄阳到温州游览胜迹多有吟诗。宋高宗绍兴

二十八年（1158），陆游出任福建宁德县主簿，南下经过永嘉，越二年返临安，再经温州，两次都有赋诗。这些名人与永嘉的渊源，使得该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给“永嘉四灵”以熏陶和启迪。在这些永嘉名人中，对“四灵”影响最大的当属谢灵运。南北朝宋永初三年（422），谢灵运被贬出任永嘉太守，仕途上的失意使他放浪形骸，恣意游山玩水，留下大量诗作。在他现存的四十多首山水诗中，永嘉一年任上就有《登池上楼》《游南亭》《登江中孤屿》《过白岸亭》《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登上戍

石鼓山》《晚出西射堂》《石门岩上宿》《游赤石进帆海》等名篇，于是永嘉之美得以为世人所知而谢灵运也因此成为我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的赫赫诗名和高风逸情令“四灵”心驰神往，顶礼膜拜，他们曾追随谢客的足迹，体会他曾经看过的山水，并留下企慕前人的诗句：

“修行谢康乐，庵有故基存。”
(徐玘《题石门洞》)

“却疑成片石，曾坐谢公身。”
(徐照《题江心寺》)

“古时山未显，谢守只空还。”
(徐照《游雁荡山八首·灵岩》)

“谢公曾步处，石鼓尚依然。”
(徐玘《谢步石鼓山》)

“欲取纱衣换，天晴起细风。清阴花落后，长日鸟啼中。水国乘舟乐，岩扉有径通。州人多到此，犹自忆髯公。”(徐玘《初夏游谢公岩》)

作为永嘉最具影响力的诗人，谢灵运成了“四灵”尊崇的偶像式的人物，他的不羁是对世俗束缚的蔑视，他的游山玩水是高士闲情雅致的表露方式，他的绝世才华更卓然立于众人之上，这些都对“四灵”具有极大的

诱惑力。他们喜欢登山临水，并大量制作山水田园诗歌，从中不难看到谢灵运的影响。

除了古人之外，他们在家乡的师友也对他们诗风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明《温州府志》载，他们的老师叶适“生平喜读书不以世务萦怀”；潘柖“平生喜为诗，下笔立成，声名籍甚，人莫能俦”；朋友薛师石“卓犖有大志”“酌古今，淡世务”“工诗书”。他们与“四灵”互相唱和，互相支持，其清淡的品味，清高的人格和对诗歌的看法与“四灵”颇有契合之处。

永嘉秀美的山水和深厚的人文气息给“四灵”以滋养，铸成了他们安于闲适的性情，也造就了他们，催发他们的诗怀，让他们痴迷于将家乡的美景付诸于诗。他们的诗歌是富有永嘉特色的，是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的结晶。厌恶世事、喜好吟咏、偏嗜清淡、以小取胜等等，无不渗透着永嘉这块文化沃土独具的气息。

[作者单位：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志办)]